

中国人大

THE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邮发代号：2-18
国内刊号：CN11-3442/D
国际刊号：ISSN1671-542X

半月刊

2011年第9期

5月10日出版 总第28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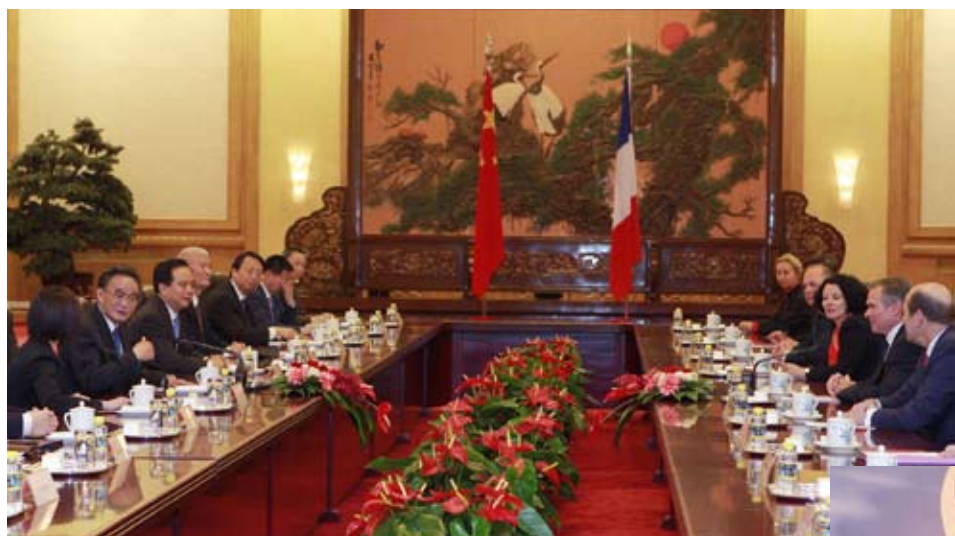
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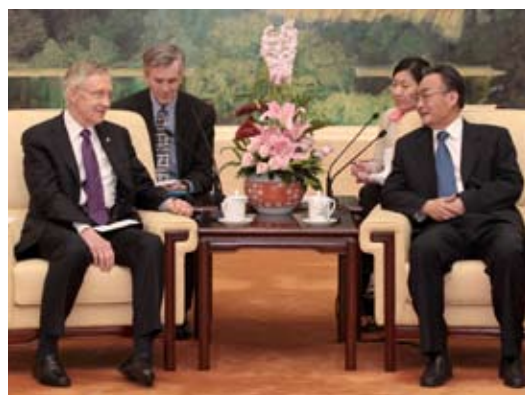
ISSN 1671-542X



9 771671 542021



▲ 4月27日, 吴邦国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与法国国民议会议长阿夸耶举行会谈。摄影/鞠鹏



▲ 4月2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瑞德。摄影/庞兴雷



▲ 4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摄影/刘建生



▲ 4月2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印尼国会议长马祖基。摄影/刘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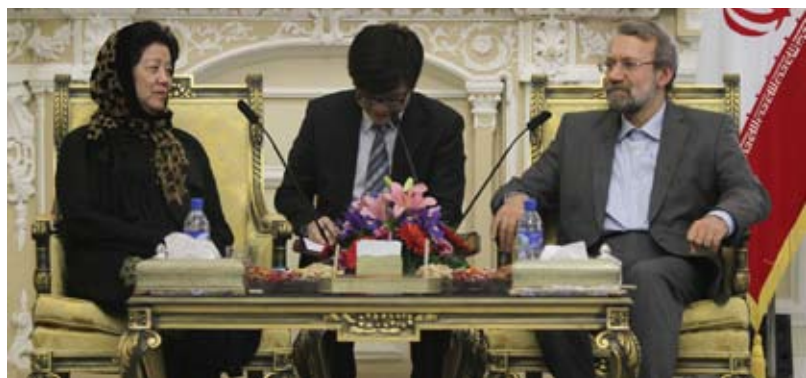
▲ 4月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主持“2011’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摄影/张勤



▲ 4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并发表讲话。摄影/张勤



▲ 4月15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左)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会见塞国民议会议长塞克。摄影/刘芳



▲ 4月20日,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右)在首都德黑兰会见正在伊朗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摄影/何光海



◀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宋鱼水



◀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文花枝



◀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丁晓兵



◀ “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普法,从日常生活开始

如果回眸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民主法制建设,就不能不提到普法。作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普法展示了中国人民尊崇法律的姿态,昭示了我们党和国家倡行法治的决心,记录了公民法律意识的生长过程。与此同时,普法本身也成为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重要动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拉近了法律与百姓之间的距离,它使法律从“制度文本”变成一种具体的行为方式,成为一种无所不在的生活氛围。

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新一轮的全民普法业已启动。如何通过总结多年普法工作的实践经验,来更好地谋划未来五年的普法之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普法是我们党在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所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着眼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普法初期的主要任务是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理念。当前,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推进,普法工作的重心也将随之作出调整。强调普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全民的法律素养,将是今后普法工作的重点。前不久,李建国副委员长在安徽考察工作时指出,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最重要的基础工

作。这一精辟的论述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六五”普法工作的重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般而言,普法是指向公众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但如果将普法工作置于依法治国这样一个语境下进行考量,它还应包括法律意识的塑造和法律信仰的培育。熟读一部法律,掌握一些重要的法律原则,也许并不需要多长时间。但法律意识的提升和法律信仰的生成,则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中既包括系统的专业训练,也包括持之以恒的坚守。

更为重要的是,要想把法律的原则、精神和核心价值渗透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理念,真正做到“把法律刻在人们的心中”,还需要把普法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到法治实践中。法律的公信力往往源于我们对日常生活中一切合法行为的追捧,源于对一切秉公执法行为的推崇。一次成功的司法实践,胜过无数次空洞的宣讲和说教。反言之,对哪怕一件违法违规行为的放纵,有时都会动摇人们的法律信仰,从而消解了普法的作用。所以,普法固然需要传播法律知识,但不能止步于此。普法还要从日常生活做起,从法治实践做起。

汪融昆

主办单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编辑出版 中国人大杂志社



2011 年第 9 期
5 月 10 日出版
总第 285 期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李建国
副 主 任 王万宾
委 员 马启智 王云龙 王庆喜 白克明
(按姓氏笔划排列) 石秀诗 乔晓阳 孙 伟 何晖晖
张少琴 李连宁 李适时 李肇星
汪光焘 沈春耀 胡康生 高祀仁
曹卫洲 黄镇东 韩晓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连宁
委 员 王 平 孔 平 冯 键 朱学庆
(按姓氏笔划排列) 何绍仁 吴高盛 张聚宁 杜世伟
汪铁民 郑淑娜 赵 杰 徐 燕
郭 瑞 高 奇 阚 珂

总 编 汪铁民
副 总 编 高 奇 徐 燕
本期执行主编 金果林
责 任 编 辑 张宝山 王聪颖
美 术 编 辑 陈玉叶

总 编 室 010-63098140
编 辑 部 010-83084071

010-63097425

010-83084429

010-83084312 (传真)

邮箱: zgrdzz@npc.gov.cn

事业发展部 010-83084070 (广告)

010-83083036 (发行)

010-63093787 (发行、传真)

邮箱: zgrdfx@npc.gov.cn (发行)

记者通联部 010-63097970

010-83084419 (传真)

办 公 室 010-63098354

010-63098540 (传真)

地 址 北京市西交民巷 23 号

邮 编 100805

国 际 刊 号 ISSN1671-542X

国 内 刊 号 CN11-3442/D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定 价 6.00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0188 号

目录 | Contents

01 卷首语

01 普法, 从日常生活开始

06 特 稿

06 红土地绽放科学发展之花

——吴邦国委员长在广西田东调研纪实

08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王兆国副委员长在贵州考察调研侧记

11 增强全民法律素养是落实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李建国副委员长在部分省(区、市)人大内司委

“五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14 本期策划

14 让普法融入生活

17 “六五”普法新征程

19 全民普法: 神州大地上的观念革命

22 法制宣传教育是长期任务

——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双战

24 言 论

委员论坛 24 重点宣传涉及民生的法律

24 不考虑效果的普法是缘木求鱼

24 普法应与道德、价值观教育相结合

25 应强调执法人员的表率作用

25 创新形式, 须在增强效果上下功夫

25 青少年普法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代表建言 26 破解“高速公路不高速”怪象

26 农产品产后损失不容忽视 增加粮食产量还要节流

26 以国家立法形式褒奖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26 破解“民工荒” 建议学日、韩设“工龄工资”

27 大学不应受排行榜的干扰

27 既要避免谷贱伤农 又要避免谷贵伤民

27 尽快制定“LED 产业促进法”

专 论 28 将司法为民宗旨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始终



4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2011’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致辞。摄影/ 饶爱民

30 特别关注

- 30 确保数字的真实
- 32 用法律来管理社会
- 34 创新社会管理：行业协会何为？
- 36 区域经济：从竞争走向竞合
- 38 农民增收：路径在哪里？
- 40 “驱动”科技创新
- 42 专题调研：让履职跃然生色

45 代表在线

- 45 赵治海：用“张杂谷”添满更多饭碗
- 46 黄 藤：公办、民办教育一起发展
- 47 贾伟平：慢性病治疗应放在社区医院
- 48 高 洪：应改变“零敲碎打”式扶贫
- 49 周 森：慈善事业亟待有法可依
- 50 童国华：信息产业既要修“路”也要造“车”
- 51 郭新志：让残疾人更有尊严地活着

52 代表风采

- 52 赵林中：心里揣着“神圣职责”
- 53 杨绍军：“阳光使者”的慈爱心肠
- 54 李红锦：人大代表不是荣誉称号
- 55 宗成乐：村官要时时为村民着想

综 合

看点 04 动作 05 新语录 05



封面图片：2011年3月23日，合肥市瑶海区农民工子弟学校——庐东学校的“普法小卫士”走进社区向社区居民宣传法律常识。摄影/ 解琛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启动 吴邦国委员长作出重要批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5月4日在北京举行,正式启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把执法检查与法律的修改完善有机结合起来,与代表议案、建议的办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监督检查,督促有关方面高度重视老龄工作,发展完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和老龄服务体系,加强老龄工作体制机制建设,进一步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切实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李建国、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出席会议。执法检查组将组成7个小组,于今年5月至7月分赴上海、安徽、福建、山东、云南、陕西、新疆等地开展检查。同时,委托其余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分别对本行政区域内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2011’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举行 吴邦国委员长出席并致辞

“2011’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4月27日上午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出席并致辞。吴邦国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论坛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与会的各国工会朋友表示热烈欢迎。他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变革,与广大劳动者密切相关。

吴邦国表示,中国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工会的地位和作用,支持工会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充分履行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神圣职责。希望各国工会组织进一步扩大交往、增进友谊、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发展互相尊重、友好合作、民主和谐的国际工会关系。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主持开幕式。★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征集意见)。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组织法修改调研组在滇调研

为广泛听取地方各级人大及有关部门和人大代表对修改地方组织法的意见建议,4月18日至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云南省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等参加调研。★

全国人大财经委调研旅游发展 及旅游立法工作

4月25日,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旅游法起草组组长石秀诗带领调研组到四川省调研旅游发展和旅游立法工作。调研组一行深入成都彭州市小鱼洞镇,考察龙门山生态旅游带、岷江河谷生态旅游区规划情况,对坚持高起点、高水准搞好旅游规划、注重资源保护、立足资源特色搞好旅游开发提出了指导意见。调研组还到阿坝汶川县水磨镇、映秀镇,实地察看了四川灾后旅游恢复建设情况。

调研组还召开旅游业发展情况调

研会和旅游立法专题座谈会,并深入景区及旅游企业深入开展调研活动。★

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情况 全国人大农委展开执法调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振伟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执法调研组于4月26日到河北省就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情况进行执法调研。

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听取了河北省政府农工办、廊坊市政府和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情况的汇报,与省、市、县有关负责人和部分基层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并深入到三河市富荣葡萄专业合作社、大厂回族自治县洼子村瓜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吴辛庄村养猪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考察,详细了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内部管理和相关扶持政策落实情况。★

贵阳市人大常委会开展专题询问

4月29日,在贵阳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的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听取和询问了市发改委关于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的报告。据悉,这是贵阳市人大常委会首次以常委会全体会议形式开展的专题询问。为开展好这项工作,常委会成立了领导小组,提前组织开展调研,收集相关资料,做了精心准备。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纷纷就贵阳市推进固定资产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的相关情况,向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轮番提问,如在大量投资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投资项目管理,正确处理成本、质量、工期及安全的关系,如何做好资金的监管,提高使用效益,防范债务风险等,并针对相关回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实事求是地回答了提问,并表示将把这些问题和建议带回去进一步研究,并及时报告整改落实情况。★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调研

4月25日至29日,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曰臣带领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调研组赴菏泽、临沂等市就《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和《山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修改稿)》进行立法调研。

调研组深入农产品加工企业、机动车环保检测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机动车环保检验工作开展情况;与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组织、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等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对草案修改稿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宋涛 范存荣)✱

上海“人大网议日”

社区话题成热点

在4月25日举行的上海“人大网议日”中,市人大代表围绕“贯彻实施物业管理新规”与网友展开讨论,“小区停车收费”等社区话题成为热点话题。新修订的《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自今年4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新规能否解决长期以来物业管理中存在的疑难纠纷?老百姓对新规实施效果又感觉如何?这些话题在“人大网议日”中最受关注。

有网友提出:小区停车收费可以理解,但是这部分地面也在业主购房的公摊面积中,也归业主公共所有,收的费用一年也有几十万元,都应该用在全体居民身上,但是现在都用在哪里了?是不是应该出台相关规定,明细收入支出的详细条目?不少网友提出疑惑:停车收费标准是由物价主管部门来定还是由开发商自己定?有没有具体标准?有网友提出,物业费按时交纳,但是如果对物业不满意,怎么办?有没有一个监督评价机制,使物业做得不好就退钱?

针对这些话题,参加当天“人大网议日”活动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市金源方律师事务所律师主任金纛与上海市人大代表、原徐汇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局长朱志荣等都一一作出回应。✱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比说任何大话都管用。

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日前在吉隆县调研创先争优、加强基层建设年活动时说道。



安全上不出事,被骂也是值得的。

4月27日,山西省省长王君在山西省工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时表示。



食品、药品领域不安全的状况,现在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危害。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



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异地重建、低水平增加GDP,更不能成为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的二次转移。

全国人大代表、波司登集团董事长高德康



杜绝保障房分配“开后门”现象,关键是制度设计先要堵住“后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国资委主任崔坚



户口是不是转成城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同城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杨晓霞



“十二五”期间应该加大力度、想方设法保证农民也能住上好房子。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三门峡市市委书记李文慧



政府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为老百姓提供保障性住房。

4月28日,针对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海口市拟废楼市“限购令”一事,海南省海口市市长冀文林首度进行公开回应。



中国法制的道路是艰难而又漫长的,我们只是走完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

红土地绽放科学发展之花

——吴邦国委员长在广西田东调研纪实

文/张宗堂 王勉

初夏时节,革命老区百色热潮涌动,红土地上生机勃勃。

4月28日至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调研。

田东是吴邦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联系点。2008年10月,他曾到这里调研和指导工作,强调田东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要做好发展特色农业,把资源、区位、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等五篇文章。

吴邦国委员长一直惦记着田东的发展。时隔两年半,他再次走进瑶族山寨、企业车间、农贸市场、学校课堂,实地了解田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就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加快贫困山区群众脱贫致富,同当地干部群众进行深入交流。

让贫困山区群众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瑶族山寨陇穷屯九分石头一分土,人均耕地仅0.38亩,2007年人均收入只有960元。吴邦国第一次来这里,看到村民住的是六面透风的吊脚棚,走的是崎岖坎坷的羊肠道,吃的是玉米糊糊和咸菜,喝的是长期贮存的水柜水,神情十分凝重。他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从解决群众最关切、最实际、最困难的问题入手,让老百姓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29日一早,吴邦国驱车数十公里,

沿着盘旋的山路,再次来到陇穷屯。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新楼房,屯中心高大挺拔的木棉树绽放着艳丽的英雄花。瑶族同胞身着节日盛装,在村口载歌载舞欢迎委员长。村干部告诉委员长,陇穷这两年的发展变化说得上是翻天覆地,大家住上了楼房,喝上了自来水,走上了水泥路,用上了宽带网,还烧上了沼气,乡亲们都说做梦也想不到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

在村民黄荣兵的新家,吴邦国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盖房子花了多少钱,有没有欠债,山上地里种什么,一年收入有多少,委员长问得十分仔细。黄荣兵兴奋地对委员长讲,盖房

子政府补了5万元,没有外债,去年种了40多亩竹子,还养了鸡和猪,全家6口人年收入超过2万元。吴邦国高兴地说,现在乡亲们的生活条件好多了,相信通过党和政府的帮扶和自己的辛勤劳动,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田东是全国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大石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群众生活困难。吴邦国强调,做好山区扶贫开发是田东实现科学发展的重点,也是工作的难点。要在把新增财力更多用于改善民生的同时,花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解决贫困山区群众的长远生计问题。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林业和林下经济,培育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二要着力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组织劳务输出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三要积极推动大石山区生态移民搬迁安置,并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等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让贫困山区群众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

发展特色农业要树立田东品牌

田东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光热充沛,无霜期长,发展特色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两年多来,田东围绕做好发展特色农业这篇文章,打造了甘蔗、竹子、蔬菜等6个10亿元特色农产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达到38.8万亩,产品抽检合格率超过98%,成为全国知名的芒果之乡和冬菜生产基地。

吴邦国来到广西新亚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这是一家集农产品种植、收购、冷藏、销售于一体的龙头企业,进驻田东仅一年多时间,就带动优质小番茄种植近7万亩。吴邦国边走边问,详细了解种植模式、收购价格、销售渠道等。他强调,发展特色农业要在专业化、产业化上下功夫,品种、品牌、品质要有自己的特色,特别要注意加强对土壤、水质和农药残留等的监测,树立起田东无公害蔬菜的品牌和信誉,让消费者安心、放心。

随后,吴邦国信步走到祥周镇中平农民合作社的摊位。正在交易的农户告诉委员长,这里就有银行终端机,买卖只要刷一下卡就成交了,既安全又方便。当地负责人介绍说,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县,短短两年多时间,田东就实现了金融机构网点服务、农村信用信息系统、现代转账支付金融工具“三个全面覆盖”,农户贷款需求满足率和覆盖率达到91%,涉农贷款余额超过全部贷款余额的65%,有力地推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吴邦国对试点取得的成效表示赞许,希望进一步深化配套改革,为全国破解农村金融服务难题积累经验。

走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子

锦江集团是田东近年引进的一家大型民营企业,依托田东及周边地区的煤炭、铝土和石灰石资源,着力打造盐化工和化学品氧化铝循环经济园。2008年吴邦国曾来到该集团田东基地,勉励他们搞成循环经济的样板项目。这次,他又专程到这家企业调研。

在田东石化工业园内,锦江集团田东基地一期工程已经竣工投产,二期工程也全面开工建设。吴邦国走进生产控制中心,详细了解技术路线和工艺流程,询问废气、废水、废渣、余热的循环利用情况。他还来到中石油援建的田东炼油装置项目工地,得知该项目即将进行联机试运,吴邦国叮嘱企业负责人,要落实安全措施,精心组织调试,确保顺利投产。

吴邦国强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既能减少环境污染,又能增加经济效益,要坚持科学规划,选准技术路线,加强资源综合利用,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彻底摆脱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

希望老区孩子个个都有出息

田东教育事业的发展,一直牵动着吴邦国委员长的心。2008年,他在考察

陇穷同心小学和田东职业技术学校后,作出要优先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2010年7月,他又亲笔给陇穷同心小学的张玉玲同学回信,希望老区孩子个个都有出息。

在委员长的亲切关怀和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陇穷同心小学和田东职业技术学校的办学条件、办学规模发生了可喜变化。这次,吴邦国特意前往两所学校看望师生。在陇穷同心小学,小朋友们将亲手绣织的壮锦送给吴爷爷。吴邦国来到学生食堂和宿舍楼,尝尝饭菜,摸摸被褥,看到同学们吃上了免费的营养餐,盖上了崭新的被子,他欣慰地笑了。在田东职业技术学校,吴邦国走进机械加工和汽车维修实训中心,同正在上机操作的同学们亲切交谈。他勉励大家要刻苦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提高实践本领,努力成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有用之才。

吴邦国指出,努力把田东的教育搞上去,关系到田东的长远发展,也是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要继续把发展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摆在突出位置,大力改善办学条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落实好寄宿生活补助政策,确保所有孩子不因贫困而失学,努力提高山区孩子就业能力,更好地把田东的劳动力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调研期间,吴邦国对田东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田东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基础设施大为改观,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吴邦国强调,田东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要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思路 and 重点,把推进大石山区扶贫开发、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作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要抓手,结合田东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实践中锻炼和培养干部,走出一条贫困地区加快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王兆国副委员长在贵州考察调研侧记

文 / 本刊记者 马增科



本刊记者/拍摄

4月14日，王兆国在贵州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考察，了解职工诉求和帮扶工作情况

四月的贵州大地，在金黄色油菜花的映衬下，更显得山清水秀，处处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4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在贵州省考察调研。王兆国在贵阳市出席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座谈会并讲话，深入贵阳市、遵义市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走访企业、工会帮扶中心，看望劳动模范、一线职工和工会干部，慰问困难职工，参观遵义革命遗址，考察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和少数民族村寨。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4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在贵阳召开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座谈会,王兆国出席并讲话。王兆国指出,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就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发表了重要讲话。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此要高度重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到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中去,推动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推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实施。

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立法工作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王兆国指出,今后,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法律的修改完善上来,抓紧修改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法律;要及时制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的法律;要督促有关方面抓紧制定和修改法律配套法规,进一步做好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清理工作,认真开展立法后评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完善。

王兆国指出,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是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的重要职责。要加强法律监督,通过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确保宪法和法律得到一体遵循。要按照监督法的规定,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选好监督重点,加大监督力度,督促和支持“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各级人大常委会要进一步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韩晓武主持座谈会,贵州省、贵阳市和贵阳市云岩区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发了言。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

贵州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从2002年成立以来,围绕困难职工、农



4月15日,王兆国在贵阳考察开磷集团循环经济工业园

民工的维权和帮扶需求,不断加强规范化建设,拓展服务内容,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成为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的第一接待和服务窗口。2010年,整合了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农民工维权中心和法律援助中心,形成了工会“四位一体”帮扶维权体系。2011年,又建立了“首问责任制窗口”,完善了具有“信访接待知情、帮扶救助暖心、法律援助息诉”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大厅。

14日上午,王兆国来到帮扶中心,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与帮扶中心工作人员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职工的诉求和工会帮扶工作情况。看着服务大厅悬挂着“真情关注、温情帮扶、热情服务、友情相融”的标语,王兆国充分肯定帮扶中心的服务理念,希望帮扶中心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推动帮扶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尽量帮助职工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法律援助律师刘湘桂从2004年以来每周都坚持到帮扶中心,义务为职工提供法律援助。在法律援助窗口,王兆国与刘湘桂律师亲切交谈。

“你觉得工会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怎么样?作为专职律师,到这儿工作收入上是不是受影响?”

“我们的服务都是无偿的,经济方面肯定有影响,但在这儿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为人民服务。”

“你的精神境界很高。司法救济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用你们的法律专业知识,帮助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职工、农民工讨回公道,这是很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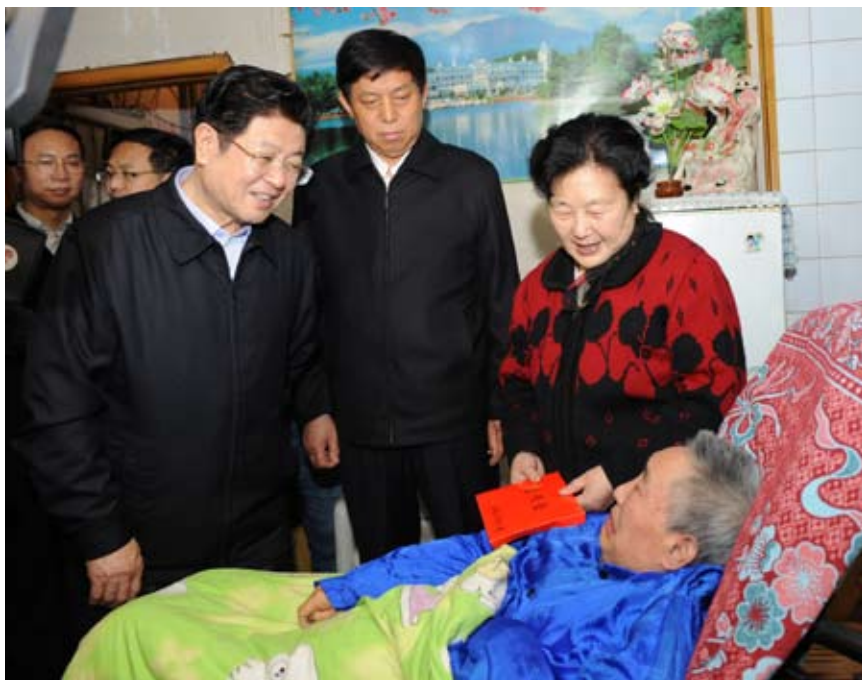
“是的,其实我们自己也很受益。做法律援助后,我才更了解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更加清楚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你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奉献精神。”

王兆国对在场的工会干部说,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切入点和重点。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应当也完全可以通过协商、协调、沟通的办法来解决劳动关系矛盾。因此,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要努力吸收更多的法律志愿者,进一步强化法律援助、劳动争议调解方面的功能。

积极推动科学发展 努力实现国家富强

14日,王兆国来到中国振华(集团)



4月14日,王兆国在贵阳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慰问困难职工

新云电子元件有限责任公司,参观了电容器生产车间、产品陈列室和企业荣誉陈列室,看望慰问一线职工、全国劳模和困难职工。

今年56岁的“全国劳动模范”曹登平是一名成型烧结工。多年来,他通过刻苦钻研和不断实践,作出了十多项技术革新,特别是钽粉混粉技术一直沿用至今,保证了企业主打产品——钽电解电容器的高质量。

在成型车间,王兆国紧紧握着曹登平的手说:“你为企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我们来看看你,向劳模学习。”

振华集团非常关心和重视劳模,专门成立了以劳模名字命名的劳模班组,广泛开展学习劳模竞赛,以此促进班组管理和职工队伍建设。

王兆国说,劳动模范不仅是企业的财富,也是国家的财富。随着高科技的广泛应用,企业设备不断升级,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劳模不仅要自己学得快、干得好,还要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职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劳模精神不能丢,全社会都要

形成学习劳模、争当劳模的好风尚。

15日上午,王兆国一行考察开磷集团循环经济工业园。这些年来,开磷集团依托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形成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物质流动模式,废气、废水、废渣全部实现再利用,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后劲。在开磷集团高强耐水新型磷石膏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利用废渣磷石膏制成磷石膏砖,每年可消耗本企业90%的工业废渣,从根本上解决了磷石膏渣的堆放和环境污染问题,并创造了客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有效地保护了周围的生态环境,周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建厂初期的29.3%提高到46%。王兆国说:“你们这是真正的变废为宝,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

在茅台酒厂,王兆国参观了新包装车间、生产车间、酒窖和国酒文化城,并与一线职工代表亲切合影。企业负责人汇报说,茅台酒的生产工艺非常特殊,每一个生产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但职工们都能以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做好本职工作,确保了茅台酒的品质。企业

发展了,职工的权益也更有保障,职工的人均收入也有了较大的提高。王兆国十分高兴地说,无论是企业的发展,还是劳动者的幸福生活,都离不开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创造性劳动。既要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又要切实维护好职工合法权益,让职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他祝愿茅台酒厂更加兴旺发达,为促进地方经济、满足人民需求、服务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18日,王兆国在贵定县盘江镇音寨布依族村视察时,走进田间,与正在耕田的妇女机耕队员们拉起了家常。他鼓励机耕队员要进一步学习农机理论知识、提高操作技术,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继承光荣传统

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遵义考察期间,王兆国瞻仰了红军山烈士陵园,向红军烈士敬献了花篮,还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和娄山关、茅台渡口,详细了解红军在贵州的艰辛奋战历程。他说,遵义会议精神、红军长征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着我们拼搏向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特别是年轻人,要学党史、知党情、跟党走,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娄山关,人称黔北第一险要。1935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渡赤水,攻下娄山关,赢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次巨大胜利,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王兆国参观了娄山关战斗纪念馆和娄山关战斗纪念碑。在娄山关毛主席诗词碑前,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起《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王兆国说,娄山关是胜利的起点,这段光辉历史再次告诉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再大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中国人民一定会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增强全民法律素养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李建国副委员长在部分省（区、市）人大内司委“五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摘要）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体公民中普及宪法、法律知识，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今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研究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在增强法制观念上下功夫，严格按照法律和政策规定开展工作，主动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和政策规定，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纠纷，依法保障人民群众权益。今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十七届六次全会上指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群众权益的必然要求。要大力增强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强化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培训，督促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准确掌握宪法、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提高法律素养，让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成为每一名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摄影/任晨鸣

批准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二是宣布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两件大事都与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密切相关。

会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纲要绘就了未来五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蓝图。“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必然要求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全

一、深入学习贯彻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

刚刚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开得很成功。这次会议有两件大事，一是审查和

面推进法制建设”一章明确提出，“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贯彻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上下功夫,进一步提高公民、法人,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法治观念,促进我国的市场主体更加健全、市场秩序更加有序、市场监管更加规范、宏观调控更加有效,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为实现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这是一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高度重视立法工作,着力解决有法可依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党的十六大重申,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党中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各个方面已经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具有以下四个标志:一是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二是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三是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四是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7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形成了以宪法为统帅、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在内,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立足中国实际,开创性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结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的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要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法律必须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规范。贯彻落实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为契机,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宪法和法律,把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作为“六五”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二、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准确把握法律学习和宣传工作重点

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围绕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围绕坚持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围绕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一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科学体系,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将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完善。这个体系刚刚正式宣布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它的学习宣传也应该说刚刚开始。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工作。要深入学习和大力宣传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进程、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深刻领会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关于“八个确立”、“五个不搞”、“六个确保”、“五个坚持”的论述,进一步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的决心和信心。

二要深入开展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处于统帅的位置。要大力宣传宪法的精神实质、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教育和引导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维护宪法的权威,牢固树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关统一的概念,牢固树立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观念,牢固树立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与水平。加强国家基本法律学习宣传,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权利义务相统一的观念,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法律义务。

三要深入开展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紧紧围绕服务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深入学习宣传加强经济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增强适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能力,增强市场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力,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供良好的法治基础;深入学习宣传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积极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水平;深入学习宣传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法律法规,为推动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四要深入开展与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深入开展劳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等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促进依法解决各种民生保障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围绕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多

发领域,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及时有效地进行正面引导,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五要深入开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就社会管理与创新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加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要开展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努力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加强与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突发事件应对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提高各级政府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促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三、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形成人人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任何法律都需要人来贯彻执行,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素养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当前尤为重要。增强法律意识,懂得依法办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带头学习法律、带头遵守法律、带头执行法律、带头宣传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成为学法、守法、执法、普法的模范和表率,努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当认真地系统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用这个科学的体系武装自己,准确把握宪法、法律和法规规定,牢固树立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牢记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而没有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开展工作,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做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宪法、法律的宣传和普及,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知法、懂法,理解我国宪法和法律是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制保障,从而衷心拥护法律,自觉遵守法律,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统一,增强辨别正确与错误、合法与违法的能力。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总之,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普遍树立起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意识,使我国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从上到下都在法制轨道上有序运行,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2011年3月24日于合肥)



2006年12月4日,沈阳的40名律师在沈阳兴隆大家庭商场为市民现场进行咨询。当日,“落实‘五五’普法规划,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主题的法律援助活动在沈阳举行

2010年12月4日,一名小朋友在北京怀柔明珠广场参加“普法大转盘”游戏活动。当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北京市怀柔区司法执法单位在明珠广场举办“普法总动员”活动。摄影/卜向东



让普法融入生活

文 / 本刊记者 张维炜

前不久,浙江金华村民程琼花刚参加完村委会的换届选举,让她感觉挺新鲜的是,今年村里来了个法律服务团,选举前后,村民有什么难题疑问,可以随时向这些律师和法律服务人员提问,有这些法律专业人士当场解答,这让程琼花感觉更公平、更公正。

另外,村里人手一册的村委会组织法小读本,图文并茂、生动易懂,也让她对村委会选举有了新认识,心里也更有谱了。

上述场景是近年来各地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的一个缩影。2010年4月底,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五五”普法也迎来了“收官”关键时刻。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司法部部长、全国普法办主任吴爱英受国务院的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五五”普法工作情况。她表示,总的看,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得到广泛宣传,全体公民的宪法观念和法治意识明显增强,依法治

理和法治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在保障和促进“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行

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需要法制保障。二十五年来,法制宣传教育将法律知识、法治理念等传播给亿万公众,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

环境。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于2011年3月24日在安徽召开的“五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五五”普法期间,我国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法制宣传教育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行。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开展依法应对危机论坛,适应市场的变化需求;在汶川特大地震面前,组织了法律进灾区、进帐篷的抗震救灾主题法制宣传;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期间,开展了“人文奥运、法治同行”、“精彩世博、法治先行”等主题法制宣传;为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开展了促进农村改革发展的主题法制宣传;法制宣传在处置拉萨“3·14”、乌鲁木齐“7·5”等重大事件过程中,更是发挥了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积极作用。

对此,吴爱英表示,“五五”普法为党和国家办成大事、办好喜事、办妥难事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开立法的普法效应

近年来,每一部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定,总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在黄镇东看来,法律体系形成过程中,立法机关与人民群众互动、立法活动专业化与民主化结合的特点得到鲜明体现,成为“五五”普法的一个显著特征。

据了解,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审议的三十多件法律草案都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来的意见汇总整理后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同时向社会进行反馈。

以年初刚刚通过的车船税法为例,草案公布后,共收到两万多名网民的意见近十万条,群众来信40封,最后法律关于税负结构等一些重要修改就考虑并吸收了社会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在公众参与立法讨论、表达意愿诉求热情空前高涨的背后,普法带给人们

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功不可没。黄镇东表示,这种普法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

劳动合同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的时候,从事家政服务的王红丽第一次提出了自己精心准备的意见,为了建议提得专业些,她还专门学习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公布后,王红丽惊喜地发现有关劳务派遣的规定采纳了她的建议。

“不同于法律通过后的被动接受和领会,主动参与立法让我对通过的法律更有亲近感。”王红丽对本刊记者说。

对此,有专家也评论称,拓宽、公开立法渠道的举措不仅是立法民主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对全民普法教育的生动实践。公众通过参与这种法律草案“全公开”下的立法讨论,可以更加全面、深入、理性地了解相关法律内容,是一种极佳的普法途径。

普法走进百姓生活

“我是个乡村医生,感觉‘五五’普法教育非常好。”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在审议中谈到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所在的河南省通许县在各县、各村都建立了社会法庭,由接受过法律培训的退休老教师、农村中比较有威望的人来做社会法庭的法官。我也是社会法官,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调解了十多起纠纷。”

马文芳认为,这种深入基层的普法宣传,有利于农民学法、懂法、不犯法,充分享受到社会和谐成果。

据吴爱英介绍,“五五”普法的一项创新就是在全国组织开展了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以“法律进乡村”为例,各地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广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农户”活动,大力开展“农村法律明白人”、“法制宣传员”培训,广泛利用农村广播站及农民夜校宣传法律知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法律六进’活动丰富了普法内容,拓展了普法途径和方式,扩大了覆盖面和影响力,增强了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使法制宣传教育更加深入基层,更好地服务群众。”吴爱英在报告时表示。

深入基层,扎根实践的普法,让人们不仅学到了法律知识,同时也享受到了法制宣传教育带来的成果。

北京市昌平区的王大妈从事社区工作多年,亲身感受到了普法带来的变化。“2007年,区里为我们请来了一位律师作为社区普法志愿者,社区发生了难以解决的纠纷或难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给律师打电话,听听他的法律建议。”王大妈告诉记者,现在社区居民的法律知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连一些退休的大爷大妈在一起聊天都经常蹦出个“夫妻共同财产”、“赡养义务”、“相邻权”之类的法律名词。“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丰富,居民们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

不仅如此,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注重用法律知识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人际关系、社会秩序,注重用法律知识来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以及政府和司法部门行为的合法性。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告诉本刊记者,“一五”普法刚开始的那几年,他到农村进行法治宣传教育,感觉农民们更多的是听个热闹,“现在不同了,他们会主动地问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宅基地、承包地上的权属和利益;开个农家乐会涉及哪些法律关系;出去打工所涉及的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工伤、生产安全等。”

“五五”普法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公众对普法已经从原先的被动接受向主动接受转化。而究其原因,李林认为,一方面是二十多年来普法对公众法律意识潜移默化的培育;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催生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并进而激发了人们对法律的“内生性需求”。李林表示,这种法律诉

求的不断增强,为普法提供了一个好的土壤。

顺应这一变化,国家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五五”普法期间法制宣传教育的一个重要主题。

吴爱英在报告中谈到,五年来,各地坚持大力加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房屋征收与补偿、土地承包流转、企业改制、医疗改革、食品药品安全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有力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服务了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

普法深入依法治理

法治是全社会的追求,更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要求。“五五”普法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治理念。

国务院关于“五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公布的数字显示,五年间,共有2.46万多人次省部级领导干部、41.53万人次厅局级领导干部参加了法制讲座。各级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同时,中宣部和司法部还联合有关部门深入推进公务员学法用法,培训公务员4200多万人次,组织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2700多万人次。

此外,据黄镇东主任委员介绍,行政机关权力的运行在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的制约之下,依法行政观念、科学民主决策、政府信息公开、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执法监督等多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以行政许可为例,从行政许可法开始实施至2010年8月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召开,中央一级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两千多项,地方各级政府取消和调整七万多项目,乱审批、乱收费、乱处罚现象得到遏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连续五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项报告

了刑事审判、民事审判、民事执行、渎职侵权检察等工作情况,推动公正司法的理念落实到基层、落实到诉讼环节、落实到案件审理当中。

“普法在培育人民群众遵法守法的法律意识的同时,也把法律交给了人民群众,使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观念和能力得到提高。”黄镇东表示。

按照“五五”普法规划的要求,法制宣传教育要与法制实践相结合,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吴爱英表示,为此国家扎实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法治创建活动,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活动不断深化。

据统计,五年间,全国有130多个市(地、州、盟)、500多个县(市、区)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创建活动,1400多个“民主法治村”受到表彰。

全国人大内司委在调研中了解到,安徽通过开展司法所进万村大服务等活动促进了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重庆的“打黑除恶”专项治理提高了群众安全感指数;福建有68.5%的行政村跨入县、市、省级和国家级“民主法治村”行列;云南昆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与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成为解决城市涉法问题、推动法治昆明建设的“三驾马车”。

“五五”普法成效的背后是全体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在采访最后,全国人大内司委司法室主任章晨对本刊记者说,与前四次普法规划相比,“五五”普法的共同参与工作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责任制得到加强,各省(区、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同志担任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承担了普法的规划、组织实施、指导协调、督促检查;各执法部门和有关单位积极向本系统并面向社会普及与自己职责相关的法律知识。各级人大为推动决议的实施做了许多工作,全国人大内司委“五五”普法期间,分别在海南、上海、安徽召开座谈会,并由常委会领导率队

到多地进行专题调研,做实人大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确保了“五五”普法目标的实现。☐

链接:

“五五”普法大事记

2006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4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五五”普法规划和决议实施工作开始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和各行业蓬勃展开。

2007年,是实施“五五”普法规划的关键之年。十七大报告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2008年,是“五五”普法承上启下的一年。4月28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文奥运 法治同行”主题宣传工作的通知》,呼吁各地、各部门和各行业的法制宣传教育职能部门积极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人文奥运 法治同行”主题宣传工作,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为重点,大力开展好奥运法制宣传。

2009年,司法部等部门深入开展“加强企业法制宣传,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题法制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以“提高农民法律素质、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为主题的农村法制宣传。

2010年,是“五五”普法检查验收之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支由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者、普法讲师团、法制宣传志愿者和法制新闻工作者组成的专兼职相结合的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在法制宣传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五”普法新征程

文 / 本刊记者 张维炜

4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标志着“六五”普法全面启动。

因为恰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和“十二五”规划开局,面对当前新形势,“六五”普法应如何担负起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普法重任,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律界关注的焦点。

对此,在记者的采访中,多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法学界专业人士表示,经过二十五年的努力,新一轮法制宣传教育将迈入纵深发展阶段,需要更加注重塑造公众法律信仰、培育法律意识。同时他们强调,只有发挥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的表率作用,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才能使普法的功效落到实处。

培养公众的法律信仰

我国“一五”普法之初强调的是向公众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识。如今,二十五年的“普法”历程回应了国人对法治的呼唤,顺应了法治对国人的期待,“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基本上知道与自己的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在发生纠纷时更加重视寻求法律帮助或诉诸法律,在发生重大事件时更加善于用法律规范来评价事件的是非曲直。”

但是近年来,食品安全、青少年恶性犯罪、枉法腐败等问题所折射出的社会诚信危机、道德滑坡,侵蚀着公众对法制的信心,引发了人们对新一轮普法路径的思考。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对法律发自内心的信仰,一个人掌握再多的法律知识也是徒然。在黄镇东委员看来,有了基本的法律知识并不等于有了健全的法律意识,“从人的素质现代化角度讲,培养法律意识关系到对法律价值和功能的理解、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对法律规范的执行,它与传播法律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因此,黄镇东表示,法制宣传教育需要传播法律知识,但不能止步于此。

全国人大内司委司法室主任章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法律宣传教育不能停留于发材料读本,讲法条的初级阶段。他认为,如果没有法律意识的塑造,法律常识很难理解,有时还会错误地认识法律。

章晨以当前社会关注的个税法修改举例说,有人认为,个税法修改就是给个人减税、减负,这其实存在误区。“在个税问题上,要考虑国家利益和个人税负之间形成平衡,不能仅看作是个人得到利益就算满足,国家是通过税赋来调控高低收入之间差距,起到的是二次分配的作用。”章晨认为,这其中体现出了普法的观念问题。他表示,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隐藏于法律条文背后的

法律精神更重要,法制教育要讲求法律意识与法律知识普及齐头并进,在传播法律知识的同时,也要注重提高公众的法观念。

但是这个理念、意识的提升过程显然不会是暴风骤雨式的一蹴而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法理学博士生导师卓泽渊教授对此表示,普法和一个国家的法治化进程一样,都有一个从表面上的量化积累,到深层次的认同,再到内化为精神、理念的过程。“最开始,当大家普遍不具备法律常识的时候,普法的效果会非常明显,但目前当我们面临着要将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时候,会发现普法的效果显现慢下来了,而这恰恰是个‘润物细无声’的漫长过程。”“因此,这时绝不能懈怠,需要一种对普法的坚守,只有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才能推动社会化的整体性的法制建设。”卓泽渊对本刊记者说。

公务员表率是最具说服力的普法

“钓鱼执法”、“躲猫猫”、“邓玉娇案”……近年来,一些执法人员和公务员置法律于不顾,知法犯法、违规执法的案件层出不穷,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应。

为此,《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明确要求,广大公务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作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政府部门的依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公正司法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体现。而“对普法最大的伤害就是执法者知

法犯法。”不少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以往普法重点对象的范围较为宽泛,“六五”普法的重点应确定为广大公务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强调,只有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守法用法,才能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为社会公众树立遵纪守法的榜样,这是最有说服力的法制宣传教育。”

“当前社会上发生的许多问题是执法工作不到位或者是行政、司法上的乱作为造成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严重。”任茂东委员表示,虽说已经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但仍然存在面上多、重点少,形式多、实效少的问题。

任茂东呼吁,公务员特别是执法类的公务员不仅自己要认真学习法、懂法,而且还要以身作则遵守宪法和法律,奉公守法、公正执法,正确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在工作中一定要做到规行矩步。“要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意识,依法尊重和保护辖区内的一人一物、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做到依法行政,切实维护法律的权威。”

法制教育,身教胜于言传。人们对法治的信心,很大程度要看对执法人员

的管理要求。吴晓灵委员认为,应充分发挥行政诉讼法的作用,用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来教育干部和群众。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吴晓灵表示,任何行政部门执法也不可能没有过错,对于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只有改正自己的错误,才能更好地树立威信。只有对那些违法、越权、无所作为的执法人员进行严惩,才能更好地教育在在职的公务员依法行政、更好地对全民进行切实的法制教育。

将普法还原于生活

普法二十多年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法制宣传教育仍面临着针对性不强、实际效果不尽理想的现状难以回避。

“不可否认,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性、长期性认识不到位、重视不够,学法用法的自觉性不够高。”哈斯巴根委员在工作实践中了解到,个别地方普法工作虽然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是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法制宣传教育搞形式、走过场的现象是有的。”哈斯巴根直言。

立法实践中,每一部法律都来源于百姓,是广大民众意志的集中体现,在

许多委员和代表看来,普法也应扎根于人民,契合百姓的需求。

“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对象,应该有不同的学习重点。”唐天标委员举例佐证自己的观点,比如,农民必须要懂得农村有关土地、林业、农业方面的法律;企业要懂得经营方面的法律;农民工要熟悉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而像河南、山西、陕西这些文物比较集中的地区则要学好文物保护法等等。“所以根据不同的对象提供他需要的法律将是‘六五’普法需要改进的问题。”章晨对本刊记者说。

实践是最好的学校,参与是最生动的学习,参与法治实践是最有效的法制宣传教育。黄镇东总结称,由于法制宣传教育对象受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生活环境、利益诉求等不同因素的影响,参与法治实践的渠道、方式、要求会有不同,因人而异、分类指导,增强普法的针对性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深层次的普法需要我们的普法视角也要作出一些调整。“过去我们讲法制宣传教育,都是单向性的,我讲你听,甚至是居高临下灌输式的。”李连宁委员认为,现在的普法应引入一些公共关系的理念,改变观念,放下架子,在一种平等地位的基础上,用一种互动交流式的方法来普法,比如通过热线电话,网络论坛来问答、交流,“这样的话,可能老百姓接受起来更好一些。”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研究员对此持相同观点。“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秦香莲、包青天、刘罗锅等许多经典名著或人物形象几乎都与法律有关。”李林对本刊记者说,法律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社会生活当中最基本的规则。在他看来,当前普法需要转变自上而下、传教士式的说教,应站在受众者的角度讲法,将法律还原于生产、生活、工作。“只有将法律变成一种自觉的信仰和自觉的生活方式,才能激发他们对法律的认同感。”李林强调道。☑



2010年10月30日,山东省政法委、省司法厅和中央电视台共同举办“山东省暨济南市便民法律咨询服务活动”

全民普法： 神州大地上的观念革命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普法工程,启蒙了中国人民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保障了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如今正继续推动中国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靠近。

“在全体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当中的一项创举。”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说,普法这项宏大的工程由于有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已深入到中国人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回顾25年的全民普法历程,这是一条充满探索和创新之路。

“一五”普法：把法律交给广大人民

“有一个老农把一条病了的牛送到检察院,请他们检查牛得了什么病,怎么治疗。”这不是冷笑话,是真实有过的事情,发生在20多年前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陆续制定和颁布了一批涉及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重要方面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司法机关也在恢复运转。然而,十年文革动乱对法制的践踏及几千年封建帝制的思想文化影响,很多中国百姓的法律观念退化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缺乏法制意识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样的社会现象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制宣传教育。198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宣部和司法部拟定的

《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不久后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在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这是最高权力机关第一次对普法作出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刘政回忆说,决议不仅肯定了普法的必要性,还明确说普法“逐步做到制度化、经常化”,有力地推动了普法工程的全面铺开并持续下去。

这年,李林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法理学专业读二年级,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法律专业高材生,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到普法队伍中,成为最早的法制宣传员之一。

“那时普法内容和形式都很简单。”现为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的李林向本刊记者回忆普法初期的情景,“我们几个同学在王府井的街边摆一个摊,拿个喇叭向大家宣讲法条和案例,主要讲‘十法一条例’,也有人会过来咨询。”李林所说的“十法一条例”包括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兵役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经济合同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第一个五年普法规划的主要普法内容。

“向公民普及这些法律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并不是全部条文,只是普及法律常识。”根据人们的整体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当时普法首先要求通俗易懂,因此编制的普法教材都是简明、通俗的法律常识读物,形式也是以

“面授为主”。

“一五”普法形式虽较单一,但把宪法列为普法内容之首,为全社会认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界定了国家和人民、人民与人民、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它直接决定了国家、人民、政府的定位和地位问题。”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法理学博士生导师卓泽渊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宪法的地位决定普及法律知识首先是要普及宪法知识,这是法制宣传教育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之后的每个普法规划在制定时,都不变地把宪法作为普法重点。

“普法作为一个新生物,从政府到公民个人都有一个摸索和学习的过程。”李林说,现在看“一五”普法存在一些肤浅和幼稚,但确实取得了积极效果。据了解,从1986年到1990年,以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为重点,以“十法一条例”为主要内容,全国大约有6亿4千万公民接受了启蒙式的法律常识教育。

“二五”普法：有了主动学法的需求

1992年一部名为《秋菊打官司》的电影红遍全中国,这部关于“民告官”的电影折射出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的觉醒。“秋菊告村长的目的不是惩罚他,而是为了讨一个公正的说法,这就是法律意识的觉醒——用法律来评判事情的是非曲直。”全国人大内司委司法室主任章晨向本刊记者表示,随着法制进程和法制教育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会用法律来维护权利。

也是在这一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需要法律来保障、规范、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里面就有大量的法治问题。”李林告诉本刊记者,民营企业 and 个体户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使得经济、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多元,“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单靠立法并不能解决所有现实中的法律问题,还必须会用法。”

领导干部必须成为学法用法带头人。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法制讲座开始正式成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工作的一部分。1995年前后,党中央举办了“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及关贸总协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的法制讲座,全国人大常委会也连续两次举办宪法和法律知识讲座,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领导干部学习法制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的热潮。“中央的做法给地方带来效仿效益,全国各地纷纷自发举办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学习法律知识。”

“领导干部一直都是重点普法对象,而法制讲座则成为领导干部普法的重要方式,通过对领导干部的普法来推进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李林表示,中央举办法制讲座的做法对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普法工作影响深远,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制讲师团”等法制讲座活动越来越常见。

除了宪法和基本法律知识,专业法律成为这时期的普法重点内容。“推动依法管理工作的开展,必须坚持以专业法律为学习和宣传重点。”司法部原部长蔡诚说。森林法、土地法、公司法、商标法等专业法和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和学习。据了解,“二五”普法期间,全国共组织学习了200多部专业法律法规,依法治国也在全国范围内燃起了星星之火,“中国的普法从一开始就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



2011年3月23日,合肥市瑶海区农民工子弟学校——庐东学校的“普法小卫士”走进社区向社区居民宣传法律常识

强调学用结合。”李林向记者表示。

“社会公众和企业对法制有了渴望和需求。”到“二五”普法结束的1995年,中国普法宏伟工程整整10年,人们越来越感到法律知识的不可或缺,普法也逐步从灌输式的“要我学”转为主动“我要学”。

“三五”普法:与法治实践结合

1996年2月8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家福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这天,他第二次走进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作法制讲座,题目为“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依法治国”终于成为可望并可及的目标,十几年后谈起这场记忆犹新的讲座,王家福仍激动不已,“‘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是所有法学工作者所期盼的。”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相应地,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在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时,将“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第三个五年普法规划的总体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把已在全国范围遍地萌芽的依法治国的尝试浪潮推向

了更高,并结出累累硕果。而普法也由前10年的启蒙民众法律知识和法律知识,向树立社会法治理念迈进,“普法向广度推进,向深度拓展。”司法部原部长张福森说。

数据显示,“三五”普法期间,全国30个省市区、95%的地级市、87%的县、75%的基层单位开展了依法治理工作。与此同时,依法治林、治水、治路、治电、治税等行业依法治理工作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

“法制教育、法治理念在社会一般层面的基础上日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了。”李林如此评价三五普法情况。此时的李林也更繁忙了,他不仅是中宣部、司法部中高级领导干部学法讲师团成员,北京、上海等省市法制讲师团的成员,还担任了建设部的立法顾问、北京市的依法治市顾问等,一批像李林这样具有高专业素质的法律人才成为普法队伍的中坚力量。

“一个以基层依法治理为基础、以地方依法治理为主体、以行业依法治理为支柱的依法治理‘三大工程’的格局基本形成。”张福森说,学用结合、普法并举是“三五”普法的一个显著特点。

伴随普法和法制建设的推进,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也逐步走向制度化、法

制化。1997年,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全国率先制定出台了《安徽省法制宣传教育条例》,其他省市也加快法制宣传教育立法步伐。有了法律的保障,“普法领导体制不断完善,普法经费逐渐到位,法宣形式日益多样,普法效果日渐显著。”李林表示,制度化、法制化给“三五”普法工作实现了一次飞跃。比如,在一些地方,法律知识和依法办事作为干部考核内容,不学法、不懂法、不依法办事者不为官,实行一票否决;大、中、小学校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开设法制课等做法在推动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树立社会的法治理念具有明显的作用。与此同时,一支具备较高法律素质的专兼职结合的法制宣传员队伍已经形成,全国总人数达700多万。

“‘三五’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确实取得明显成效。”张福森解释说,初步实现了从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提高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全民法律意识的转变,从单一普法向全面推进依法治理实践的转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在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新世纪普法:形式多样重实效

“四五”普法起始之年的2001年6月27日,由司法部主办的“中国普法网”正式开通,法制宣传在现代传媒领域有了自己的阵地;同年12月4日,在宪法颁布纪念日这天,人们迎来了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到“五五”普法末期,“全国省、地级电视台已开辟法制栏目430多个,县级电视台开辟法制栏目1530多个,建立普法网站2300多个……”跨入新世纪的普法工作,形式越来越多样化、立体化,以法制长廊、法制公园、普法大篷车等形式的公共场所变成普法重要阵地,楼宇电视、手机报、城市公交车电视等新媒体也成为法制宣传的新平台。“形式多样、生动形象的各类普法活动把法制宣传教育的触角延伸到每个人的身边,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

活。”参与普法25年的李林感叹如今普法的多样化和实效性。

中国普法的工作者从未停止过对更具实际效果的普法方式的探索,创新在近十年的普法工作中尤其明显。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市制定了专门的奥运法制宣传计划,在全市广泛开展以“人文奥运 法治同行”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活动,形成“手里有书、墙上有报、电视有影、广播有声、网上有信息”的全方位覆盖局面。“提高了市民法律素质,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法治氛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的王玲处长向本刊记者表示。

这种以国家重大活动和工作重心为主题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得普法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行,“起到了良好效果,是值得传承的经验。”全国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黄镇东说。主题法制宣传也成为普法的新模式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

同样,普法的工作机制也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创新。如今在安徽,许多人知道并参与一个叫“江淮普法行”的活动。“江淮普法行”是2009年由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牵头,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三家联手的法制宣传活动。“这个工作机制,将普法办普法的职能,新闻单位宣传的职能,人大机关监督的职能有机结合起来,三位一体,形成合力。”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内司工委司法监督处副处长王玮告诉本刊记者,该机制有效地解决了以往普法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牵头“小马拉大车”、“单兵作战”等瓶颈问题,有效提升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短短两年,“普法江淮行”已经成为安徽省乃至全国知名普法品牌,吸引了许多省市前来学习、借鉴。

再如,从“五五”

普法开始在全国组织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的“法律六进”活动,把法律无缝覆盖到社会每个群体,让社会全体参与到普法中,“是普法工作制度的又一项重要创新。”

“要把普法工作深入持久和有效地进行下去,就必须以创新的精神,善于总结普法实践的经验,不断开拓新的途径,创造新的方法。”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说,普法工作如何打开新局面、更显实效,是摆在普法面前的新难题,普法仍需要不断创新。

普法的目的是全社会知法守法用法,就像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中提出的“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2010年,我国如期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站在了更高的起点,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普法不但不能停止,而且必须更有实效地坚持下去,“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长期目标,为法治国家建设打基础的法制宣传教育也是一项长期任务。普法工作依然‘在路上’,不能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松懈心理,也不能有厌战情绪,而是要坚持不懈地打好持久战。”黄镇东如是说。✘



江西省万年县司法局组织人员为返乡农民工和在外务工人员亲属开展农民工维权法制宣传活动

摄影/徐高

法制宣传教育是长期任务

——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双战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刚刚结束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这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作出关于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也开启了我国的又一个五年全民普法。

走过25个年头的普法工程,恰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十二五”规划开局,我们在讨论新起点上的普法工作该如何开展的时候,必须充分总结和吸收二十多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丰硕经验。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吴双战。

遵循法制宣传教育规律

在过去几年里,很多事件案件为公众所熟悉,如:“3Q”之争、南京彭宇案、广州许霆案、巴东邓玉娇案、深圳梁丽案等,这些事件案件发生后,许多网民参与讨论,最终的结果也与公众的期望基本一致。“这说明了通过二十多年的普法,公民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与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取得了一致,这是普法取得效果的标志之一。”吴双战充分肯定了我国普法工作取得的成效。

吴双战说,普法的目的是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提高人的法律素

质。但意识和观念的形成和改变很难用数据统计指标衡量,因而普法有别于一般的工作。“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普法效果看不到、摸不着,因此产生厌战情绪,这就是有点急功近利了。要求普法立竿见影,跟工厂做工一样马上见到具体成效,恐怕不符合法制宣传教育的规律。”

吴双战表示,普法工作必须遵循法制宣传教育的规律,其规律就是普法具有对象的普遍性与普法内容的普及性。他说,普法对象的普遍性强调的是一切有接受能力的公民都应当接受法制宣传教育,这决定了普法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而普法内容的普及性强调的是法律常识的教育而不是专业性的法学教育。“如果没有二十多年来对法制宣传教育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如果不是立足于现实条件,着眼于现实需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和法制建设发展,向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进行最基本的法律知识的普及,我国公民的法律素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就不可能取得现在的成绩。”

有了基本的法律知识也不等于有了健全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的形成与法制宣传的方式方法有着密切关系,“从人的素质现代化的角度讲,培养法律意识与传播法律知识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它关系到对法律价值和功能的理解、对法律权威的尊重、对法律规范的执行,因此,比传播法律知识要求更高。”这就要求法制宣传教育的方式和

形式要能够潜移默化、春风化雨、入脑入心、具有针对性、取得实效。

“25年普法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中学习法律,用法律认识和指导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学用结合,可以入脑入心,从学法、守法到用法、护法,提高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吴双战向记者举例说明,让青少年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企业员工了解劳动法、合同法,向农民宣传土地承包法、种子法,等等。“因人而异、分类指导,有针对性的回应人民的要求,才能使普法教育取得最佳效果。”

“培养法律素质和法治理念的法制宣传教育是一项任重道远的长期性工作,不能急功近利,要把法制宣传教育看作长期的任务,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吴双战强调。

公职人员表率作用至关重要

“国家机关特别是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按照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要求来行使职权、履行义务,是衡量普法效果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吴双战向记者表示,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包含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和法治理念,而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则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具体体现,公务员的遵纪守法依法办事能成为最有说服力的法制宣传教育。因此,他认为普法工作要抓住国家

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这个关键。

“如果有一起案件裁判不公，一次行政执法违法，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法制宣传教育取得的效果就可能受到强大的冲击，并影响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吴双战表示，如果群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公正廉洁丧失信任和信心，要想恢复这种信任和信心就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恢复信任和信心的前提也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承认并纠正错误。“古人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公生明，廉生威’，就是这个道理。”

此外，公务员学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也能使群众正确认识法律，“在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是制约权力的，通过普法让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得到提高，能够更好地对政府的行政行为和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吴双战提出，普法必须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只针对老百姓，国家机关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否则普法就会偏离法治的目标。

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如何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吴双战表示，不仅要强调公职人员依法办事的表率作用，还要高度重视法制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结合起来，着力开展关系民生与发展问题、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热点问题、人民内部矛盾调解问题、公民权益保障问题和贫弱群体法律援助问题等法律服务工作，让人民群众在法律实践中体会到法律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才是尽到了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

“只有国家公职人员模范遵守和执行法律，老百姓才会服气，法制宣传教育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也就能形成我们常说的‘百姓监督政府，政府服务于百姓’的双向关系。”

人大的立法和监督实践是普法的活教材

从普法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始，全

国人大常委会都对法制宣传教育作出了相应决议，以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普法的决心。每个普法决议的起草及普法规划实施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要通过多次调研、视察、座谈会、听取汇报等形式，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监督普法工作的开展。地方人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内司委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地方各级人大和内司委积极主动。”吴双战又说，如果认为人大在普法中的作用仅仅在于作出决议那就片面了。“人大不光要看监督对象是否严格遵守法、执法、依法办事，也要通过立法和监督活动，让老百姓看到国家依法治国的决心，看到保证法律得到严格遵守的决心，把这当成法制宣传教育的一个过程。”吴双战认为，依法治国是全党、全国的目标，是我们治国的基本方略，人大工作的过程及成果本身就是一部法制宣传教育的活教材。

吴双战表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立法既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推进依法治国活动，同时立法过程本身又是统一认识、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人大工作其实是法制教育的一种实践活动，对公民法律素质的培养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因此，人大工作是法制教育的重要阵地。”他向记者解释说，人民群众通过参与座谈会、论证会和听证会以及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直接对法律草案提出意见和建议，亲历立法过程，本身是一次良好的法制教育。据了解，



常年活跃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草原上的县、乡马背普法队在给牧民宣讲法律知识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来审议的31件法律草案都在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征求来的意见汇总整理后又向社会反馈，并提供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审议时参考。

吴双战表示，要充分发挥人大工作这个普法阵地的重要作用，接下来要继续引导和组织公民参与立法活动，完善立法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和程序，健全听取和采纳公众意见机制，将法律精神、法律制度传达给公众，将公众的关切、公众的建议传达给立法机关，使国家制定的法律真正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共同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各级人大要通过听取专项报告、开展调查研究、组织视察检查等方式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监督和支持，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六五”普法决议顺利实施。☑



4月2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听取了国务院关于“五五”普法工作情况的报告,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草案)。21日,在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在深刻总结“五五”普法经验基础上,从多重视角对新一轮普法工作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在此,特摘发,以飨读者。

重点宣传涉及民生的法律

文/ 白克明



我认为“六五”普法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深入。我们前不久进行了食品安全法的执法检查,从初步检查的情况看,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懂法、不了解法。比如,这次瘦肉精事件,瘦肉精的使用相当普遍,我们初步了解到的是老百姓养猪用瘦肉精没有人管,有一些养殖户不知道不该用,就知道用了以后能卖出好价钱。这一方面反映农民不知法,另一方面反映基层的执法力度非常薄弱,经常性的执法检查、执法监督很不够。同时,也反映我们的法制宣传和教育还不十分普遍、不深入。很多人不懂法、不知法,也就做不到不违法。所以法制宣传教育如何深入,减少一点形式主义,多做一点扎扎实实的事情,我看很有必要。

要深入就是要抓重点,法制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广大人民群众来推动依法治国,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应把涉及民生的一些法律,更多地作为法制宣传的重点。这些法律表面上看起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不承担很大的政治分量,但最终还是涉及政治,比如现在食品安全的很多问题都是基层的执法检查力度太薄弱造成的。所以,我认为,法制宣传教育切忌形式主义,脱离实际、脱离老百姓的利益。另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之后,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问题,需要加大力度来解决。✘

不考虑效果的普法是缘木求鱼

文/ 任茂东

五年来,决议得到较好的贯彻实施。推动了以宪法为

核心的国家基本法律的学习宣传教育,进一步强化了公民法律意识,促进了依法行政,提高了全社会法治化管理的水平,基本达到了预定目标。为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保障“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推动形成全体公民自觉守法的社会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是必要的、可行的。法制宣传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关键是司法部门要转变观念,从“要我学法”到“我要学法”的转变。“要我学法”的理由是不计其数,但是,“我要学法”的理由归根到底就是一条——对我有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应根据不同的对象或者群体,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普法活动,如果不看对象,免费发放1200万册知识读本,其效果多大,很难说。不考虑效果的普法活动,可能是缘木求鱼,其结果可能会徒劳无功。因此,“六五”普法要使普法与人民群众对法律的需求更加贴近、更加适应。✘



普法应与道德、价值观教育相结合

文/ 吕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如何提高全国人民依法行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也需要相关的制度来保障。目前,加强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加强公民法制意识教育很迫切,普法工作的关键是要提高有效性,要长抓不懈,探索新的做法。现在



青少年犯罪、恶性犯罪多,如“药家鑫案件”,食品安全问题

以及社会诚信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等也不断出现,都有相关的法律,但是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在普法过程中应该注意普法与道德、公德教育相结合。因为法律是社会道德的体现,也是一个底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的标准、没有社会的价值观,那么人人都有可能犯法。现在很多问题不是有法没法的问题,而是道德和价值观的缺失。因此,在普法过程中,一定要与道德教育、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普法的效果并不在于召开了多少次会、做了多少个节目,关键是要看大家的法律意识是否提高了,大家是否都遵纪守法了。✘

应强调执法人员的表率作用

文/ 朱启



目前,从宏观、全局来看,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我们还要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不学、不懂、不会的还大有人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在一些领域和一些部门还是比较严重的。法律宣传教育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要实事求是地看到这些情况。这次决议草案突出

强调了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这一点我非常赞成。这些年,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违规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群众反映还是比较强烈的。分析普法工作的基本经验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重点需要予以高度关注,一个是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特别是国家机关执法人员;另一个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学法、守法、用法程度。他们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直接影响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影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程度。1991年、1996年通过的决议专门强调对高级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的宣传教育问题,建议这次的决议也能对这类群体的宣传教育提出明确要求。✘

创新形式,须在增强效果上下功夫

文/ 邹萍

一个好的形式往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普法应跳出宣传教育传统的模式,积极探索与学习内容相适应、大家易于接受的新型的宣传教育方式,不断增加普法教育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创新普法形



式:一是要利用互联网开展普法教育,开辟普法教育网络专栏,通过大家点击查看,进行没有教室,没有老师,没有课本的学习活动。二是要利用电气化教学手段,开展普法教育。电气化教学的手段具有声情具备、图文并茂的特点,易于被大家理解和接受。要大力倡导利用多媒体观看法制宣传教育图片等形式,对大家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三是要利用反面典型进行现身说法,可以通过组织干部职工到监狱、刑场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农村通过现场办案,面对面地进行法制教育,这是最好的普法方式。四是要充分利用文艺演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重要的节日文艺汇演中要把普法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寓教于乐。✘

大家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三是要利用反面典型进行现身说法,可以通过组织干部职工到监狱、刑场听服刑人员现身说法,农村通过现场办案,面对面地进行法制教育,这是最好的普法方式。四是要充分利用文艺演出,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在重要的节日文艺汇演中要把普法教育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寓教于乐。✘

青少年普法要符合他们的需求

文/ 范徐丽泰

我理解法制宣传教育的目的是要树立社会的法治精神,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个人的合法权益,也包括履行个人的义务等。为什么后面这条这么重要?因为我发现在宣传法律时,很多人接受的信息就是我的权利,不一定接受要履行义务的信息,可是权利和义务是携手并进的,如果只讲权利不讲义务,



对社会和谐有害无利。我认为,如果能够建立起社会的法治精神,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我非常同意把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在法制宣传教育中的重中之重,因为他们一个是管理国家的团体,一个是未来管理国家的希望。关于青少年,我认为必须要有一套能够符合青少年需要的普法方式。根据我的了解,在香港青少年根本不看电视、报纸,看的是互联网。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宣传,是不是符合他们的需要?如果还是一套说教式的“你要怎样、应该怎样”,这种宣传青少年不会接受的,看两眼就不再看这个网页了。我曾经上网去看政府部门的东西,大多是部门宣传自己的,没有考虑到对方想看想要的是什么,我觉得这种网页就没有实现宣传的效果,浪费了资源。对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我建议在做之前,先找一些青少年的朋友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想看什么东西,甚至在编资料内容时也找他们来帮忙。✘

破解“高速公路不高速”怪象

“在跨路段收费站、省界收费站、大桥收费站等各类收费站点,经常有车辆排长龙等待缴费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院长尹传贵说,应该在全国高速路网间推行“一卡通”,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收费和结算的模式,减少和消除因收费站点多而引发的梗阻现象。

尹传贵代表说:“我国高速公路多种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并存,导致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收费和管理各自为政。同时,高速公路的属地管理导致一条高速路上有多处收费站,不仅增加了人力和经济成本,也使得高速公路不高速。”

他认为,高速公路收费站林立、收费站点过多等等,是引发部分路段交通拥堵的根源。尽管高速公路“一卡通”全国大部分省区已经实行,但是存在省与省之间不能通用,使得收费站前特别是跨省区交界处,经常出现绵延数公里或数十公里的车辆拥堵现象。

他建议,实现全国高速路网管理主体的统一,提速高速路网的信息化建设,实行全国统一收费信息联网。同时,加强人性化管理,优化出入口设置,开设或者在服务区增加公共汽车乘车点,让高速公路更加便民、惠民。★

农产品产后损失不容忽视 增加粮食产量还要节流

“我们每年都提要增加粮食产量,为此也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可对由于农产品产后处理不当造成的损失却重视不够。增加粮食产量,不仅要‘开源’,还要‘节流’。”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能源环保研究所所长赵立欣呼吁。

赵立欣表示,目前来看,产品初加工是农业到农产品加工业整个产业链条中的突出“短板”。“由于农产品产后处理

不当,加工方法原始、设备简陋,在烘干、储藏、保鲜等环节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增产的数量。”

“据测算,我国玉米因产后储藏不当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800万吨,马铃薯超过1400万吨,水果蔬菜的损失量也很大。”她说。

赵立欣表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农户普遍缺乏必要的设备及技术指导。

“我去农村调研过,很多农户把粮食放在马路上、屋顶上晾晒。粮食的储存在温度、湿度方面都有要求,过度暴晒或者变潮,造成产量损失是直接的,还会导致粮食变质,也出现了有人把变质的粮食处理后卖到市场上的现象,造成了食品安全隐患。”

“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充分认识到解决农产品产地初加工问题的重要性。目前农机补贴中已包括初加工的机械设备,但不包括烘干房、储藏窖等产后处理的必要设施。建议把这些设施纳入到农机补贴范围或建立单独的专项补贴,鼓励农户购买相关设备,并加强技术指导,以减少农产品产后损失,增加产量,提高质量。”赵立欣说。★

以国家立法形式 褒奖保护见义勇为人员

“做了好事反惹麻烦、‘英雄流血又流泪’、‘光荣一阵子,痛苦一辈子’的事情近年来时有发生,致使有心做好事但不敢做的人越来越多。”谈到社会上的“冷漠病”,军队人大代表、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参谋长张学锋语气十分沉重。

拍拍案头正在修改的关于制定国家层面《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的建议文稿,张学锋代表说,目前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对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规定,散见于宪法、行政法、民法等法律法规之中,且多属于原则性规定和要求,落实起来缺乏刚性和具体的标准,很有必要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倡导、规范

见义勇为行为,奖励、保护见义勇为人员,进一步激发积极、健康、关怀、互助的社会风气。

张学锋代表建议,由全国人大制定颁布“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法”,或由国务院制定颁布《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护条例》,界定和规范助人为乐与见义勇为行为,规范非专业人员救助责任及免责范围,规范专业人员救助责任及免责范围,明确国家对与违法犯罪分子作英勇斗争人员的具体保护方法和措施,明确救助者因施救行为导致自身损害由国家予以补偿的规定,明确奖励见义勇为行为的标准、措施和方法,明确对诬告陷害、打击报复见义勇为人员的惩治规定,使对见义勇为人员的奖励和保护获得独立的、严密的法律支撑。★

破解“民工荒” 建议学日、韩设“工龄工资”

“民工荒”到底荒不荒?广东的官员称该省民工不荒,而浙江与天津的则表示用工确实荒。荒与不荒众说纷纭。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春节以来,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用工荒”愈演愈烈,成为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董事局周晓光拿出了浙江省金华市劳动就业局2010年底的调查数据:去年该市用工缺口约为20万人,仅金华市区就达4万人之多。

“用工荒”对这些企业来说,意味着开工力不足,代表着企业经济效益的下滑。因此,如何解决“用工荒”问题?“为员工增设‘工龄工资’的做法,是较可行的举措之一。”赵林中介绍,“工龄工资”最早源自日本,迄今全球数日、韩两国做得最好,百余年来已被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不分所有制形态的企业普遍采纳,“‘工龄工资’主要特点是承认员工对企业所作的‘年资贡献’,使员工对所在企

业产生归属感。”

赵林中表示,有了“工龄工资”,可以有效减少员工的流动性,确保企业和员工都可从“队伍稳定”和企业发展中分别受益。

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表示,企业要通过成果共享来留住员工。他以自身企业为例,他们每年招工,外面都排起长队,“我们不断提高员工收入水平,给外来员工提供住房。”宗庆后表示,民企只有给员工增加收入,他们才会勤恳。

全国人大代表、任职于天津天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棉纺织工厂的张晓燕最有感触,她告诉记者,现在80后的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不再像她那个年代看重稳定,他们越来越注重的物质与精神双丰收。企业要留人,不仅要增加员工收入,还要给他们带去家一样的感觉,让他们呆得安心。✘

大学不应受排行榜的干扰

“现在社会上出现很多所谓的大学排行榜,在无形中形成一个指挥棒,无论是对一些高校的办学思路,还是对学生和家长,都产生了一定的干扰,应该尽量避免这种干扰。”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这句话,引起记者的关注。

周绪红代表说:“很多所谓的大学排行榜,一般都是综合性大学名列前茅,一些行业特色比较鲜明的学校往往进不到排行榜中,高等教育的活力在于多样化,鼓励特色发展,鼓励相互补充,如果让所有的大学都按照清华、北大的办学思路,那必然会失败。”

目前,就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新问题,从事高等教育二十余年的周绪红代表用“扩招、升格、校区扩张、举债”四个词来概括。“其中的‘升格’就是一些专科院校升格为本科院校,普通大学升格为研究型大学等,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让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考验。”周

绪红代表说。

在谈到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时,周绪红代表说:“应该调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类型与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多开办专业教育,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学校应该加快发展速度。”

“我国的教育培养观念应该既要强调精英教育,也要强调公民教育,应该是一种‘顶天立地’的人才培养观。同时,在目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既有国际视野,又有‘本土情结’。”✘

既要避免谷贱伤农 又要避免谷贵伤民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政协副主席别胜学说,在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加大背景下,既要避免“谷贱伤农”,又要避免“谷贵伤民”,建议设立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基金,把粮价调控在一个适度的平衡点。

别胜学代表认为,粮价作为“百价”之源,粮价不稳会导致后续产业链条一系列产品价格的波动。因此保持粮价在一个相对合理范围之内,既要让农民增收,又不致于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造成太大影响。

针对物价问题,有人大代表认为,我国有8亿农民,粮食、蔬菜包括肉食适当涨价是正常的,保障农民利益才是保障我国大多数人的利益。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神华工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彦群认为,关键在于物价上涨了,工资标准没有跟上去,对城市低收入群体生活直接造成影响。“国家可以更好地利用税收杠杆进行调剂,个税起征点应该适当提高,注重提高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大国,‘谷贵’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对低收入群体不构成太大影响就可以了。”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富霞农业种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富霞认为,目前我国的粮食价格并不高,虽然表面看粮价比前几年有所上涨,但实际上农业生产所有环节的成本费用都在逐年增加。以

农村人工费为例,原来种一亩地人工费只有几十元,现在已经达到200元左右,秋天割地每亩地已经涨到300元。她说:“表面看粮食价格涨了,农民收入增加了,但去除成本上涨因素,农民的纯收入上涨幅度并不大。”

李彦群代表认为,今年中央继续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谷贱伤农”现象已经不可能发生,下一步需要关注的主要是城市低收入群体问题,如何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在涨价中有明显下滑,避免“谷贵伤民”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快制定“LED产业促进法”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市委书记王燕文建议尽快制定LED产业促进法。王燕文说,我国LED产业发展已成为世界LED产业发展最快、潜力最大的国家,2010年总体规模达到1200亿元,年增约40%。

王燕文指出,就目前LED产业发展的现状来看,显示出了市场的迫切需求和产业发展的良好前景。但与国际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LED产业规模小、产业的整体水平不高,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弱,标准与检测的体系有待完善。

王燕文认为,我们要建立LED行业标准体系,加大LED行业关键技术研发投入,重点扶持国内LED产业化基地,加强LED照明产品在公共工程的应用及全社会的推广,明确用LED节能照明产品逐步淘汰白炽灯等低效率照明产品的时间表,加快制定税收补贴等激励政策。

为此,王燕文提出国家尽快制定“LED产业促进法”,系统地对产业标准制定、关键技术研发、政府优先应用、鼓励市场应用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推动我国LED产业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发展的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王燕文表示,制定“LED产业促进法”,这是培育引领未来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迫切要求;是增强产业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

将司法为民宗旨 贯穿人民法院工作始终

文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



王胜俊

人民权益。各级人民法院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理念,努力把司法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

一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关切和期待,依法做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案件的审理工作。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涉及人身损害、住房、医疗、教育、消费者权益保护、劳动争议等案件1294408件,审结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1428340件,审结涉农案件238913件,有力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大力推进司法便民利民工作,努力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

设,进一步完善“立案信访窗口”的基本功能和基础设施,建立健全首问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待、岗位责任等制度,完善导诉咨询服务,改善硬件设施,规范法官接待行为和用语,努力为群众提供良好的诉讼环境。为切实方便群众诉讼,一些案件较为集中地区的法院设立了金融案件审判庭、劳动争议审判庭、家事审判合议庭、涉农案件合议庭等专门法庭或合议庭。在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

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大力推广巡回审判方式,深入农村及偏远地区,就地立案、就地开庭、当庭调解、及时结案,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诉讼。为方便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诉讼,各级人民法院大力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693个新建审判法庭和600多个人民法庭配备了无障碍设施。各级人民法院还加大司法救助工作力度,为当事人减免诉讼费9656.47万元,使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够打得起官司。

三是着力做好涉诉信访工作,努力解决信访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各级人民法院切实增强对涉诉信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始终把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放在首位,全面做好集中清理涉诉信访积案工作,落实领导责任和办案责任,落实领导干部定期接访和上级法院带案下访、巡回接访等制度,努力解决信访当事人的合法合理诉求。最高人民法院组成12个合议庭和案件复查组,帮助地方法院开展工作。各级人民法院一手抓积案化解,一手抓案件质量,注重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案件,去年共接待信访1066687人次,同比下降21.43%。

二、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人民群众期盼和谐、期待稳定。为妥善化解群众之间的矛盾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标,各级人民法院

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自觉坚持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点,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围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认真做好审判执行工作,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切实维护人民权益。

一、坚持以人为本、司法为民理念,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服务科学发展,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

设,进一步完善“立案信访窗口”的基本功能和基础设施,建立健全首问负责、服务承诺、办事公开、文明接待、岗位责任等制度,完善导诉咨询服务,改善硬件设施,规范法官接待行为和用语,努力为群众提供良好的诉讼环境。为切实方便群众诉讼,一些案件较为集中地区的法院设立了金融案件审判庭、劳动争议审判庭、家事审判合议庭、涉农案件合议庭等专门法庭或合议庭。在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

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努力实现和谐司法。

一是强化调解优先理念,积极运用调解方式处理矛盾纠纷,着力构建覆盖立案、审判、执行全过程的调解机制。努力做好民事案件调解工作,2010年,各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同比上升3.31个百分点。积极探索刑事自诉案件调解、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认真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做好行政案件协调工作,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积极促成执行和解,依法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同时注重规范调解工作,对不能调解及调解不成的,及时依法裁判,切实发挥调解和判决两种结案方式在化解矛盾中的作用。

二是加强诉前调解工作,积极推动多元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建设。认真落实《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就近、就地选择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加快各地基层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室、诉调对接中心和“人民调解工作室”建设,进一步加强与人民调解组织、行政调解组织以及其他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规范诉调对接工作,充分发挥诉前调解分流案件、化解矛盾的重要作用。

三是发挥司法的引导作用,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在坚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司其职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司法的引导、保障、促进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与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关以及村委会、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侨联等组织密切配合,积极促进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化解社会矛盾的良好局面。

三、坚持全面加强法院队伍建设,为落实司法为民要求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能否为人民群众搞好司法服务,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院队伍。各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切实采取措施,着力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一是加强教育培训,大力提高法官的司法能力。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司法能力为目标,努力实现培训工作由理论研究型向理论与实践结合型转变,由知识培训型向知识与能力结合型转变,大力倡导法官教学、现场教学、案例教学,圆满完成对3622名中级、基层人民法院院长和8899名人民法庭庭长的轮训,开展了对3万多名执行人员和近2千名国家赔偿工作人员的培训,举办全国高、中级法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千人培训班;学习推广陈燕萍工作法,有力提升了广大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开展群众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年度培训计划,推进双语法官培养,组织并资助新疆、青海、内蒙古等地编写双语法官培训教材,不断加大对民族地区法院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

二是改进司法作风,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改进司法作风,最高人民法院修订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和《法官行为规范》,制定了《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以贯彻落实这三个文件为契机,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把“公正、廉洁、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体现到执法办案的各个环节。加大法院文化建设力度,组织评选40个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文化建设凝聚人心、陶冶情操、推进工作。表彰宣传了“群众信服的好法官”陈燕萍、“时代先锋”全国优秀法官龙进品、勇斗歹徒光荣牺牲的全国模范司法警察钟世

鑫等先进典型,树立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三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努力促进司法廉洁。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和干警思想实际,在全国法院广泛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法官职业道德教育、职业纪律教育,通过正面典型示范和反面典型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干警不断加强党性修养,进一步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加大司法巡查工作力度,最高人民法院派出8个司法巡查组,对8个高院开展了司法巡查,向相关高院提出整改建议46条;全国共有26个高级人民法院、246个中级人民法院建立了司法巡查制度,共对1803个下级法院进行了司法巡查。积极推动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制定了《关于配偶子女从事律师职业的法院领导干部和审判执行岗位法官实行任职回避的规定(试行)》,出台《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增强廉政建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普遍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各级人民法院共任命廉政监察员30623名,切实加强对审判执行人员纪律作风状况的日常监督。狠抓“五个严禁”、《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的落实,推动各高级人民法院统一开通与最高人民法院联网的违纪违法举报网站,切实加大对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促进司法廉洁。

2011年是“十二五”时期开局之年,人民法院依法促进科学发展、维护人民权益的责任更加重大。各级人民法院要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记司法为民根本宗旨,更加努力地做好审判、执行工作,更加积极地回应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确保数字的真实

文 / 本刊记者 于浩

GDP 为39.8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879 万亿美元。

粮食产量54641 万吨,比上年增加1559 万吨,创历史最高水平。

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 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10.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 元,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近年来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

这一串串的数据,见证的是中国经济在2010 年首次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标志着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粮食丰收、国泰民安和谐景象;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不仅使城市人得到了实惠,而且也让农村人尝到了甜头……

而这一串串的真实、可信数据的得来,要归功于中国大大小小的统计部门。“统计是经济社会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统计职能的认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统计部门承担着全面反映国情国力状况,客观描述经济社会状态,及时监测经济社会态势,准确揭示经济社会规律的重大责任。

坚定不移追求统计数据的真实

一串小小的数字,可以说明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国际地位的提高,但有时还是这一串小小的数字,也会预示物价上涨,消费者信心下滑等棘手问题。

比如,用CPI 来代表的物价总水平是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一个反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



2010 年10 月20 日,河南省宝丰县举办了庆祝首个“世界统计日”暨人口普查万人签名仪式

一个经济体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反映。2010 年,CPI 呈现出逐季加快上升的趋势,一季度上涨2.2%,二季度上涨2.9%,三季度上涨3.5%,四季度上涨4.7%。面对国家统计局给出的CPI 变动趋势,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采取了增加供给、调控需求、保障流通、调控市场,以及给低收入群体增加补贴的措施。去年12 月份CPI 涨幅相对于11 月份,无论是环比还是同比,都出现了明显的回落。这就意味着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这些措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

由此可见,要做好政府决策的参谋助手,数据的准确、真实就是统计部门不断追求的目标。为了能让统计数字及时准确,国家统计局采用了全

国4 万家大中型工业企业、8000 家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5000 多家重点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企业以及参加采购经理问卷调查的2000 多家企业,通过联网直报方式报送的统计数据。

“2010 年,国家统计局在统计改革创新中取得了重大进展。”马建堂说,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制定地区GDP 统一核算方案。房地产价格统计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制定住宅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进展顺利,确定城乡住户调查范围,统一主要调查指标名称和口径,建立统一的城乡住户调查抽样框。服务业统计进一步规范,制定《服务业统计基本规范 and 实施意见》,新建房地产物业管理、房

地产中介服务抽样调查制度,制定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方案。各项专业统计改革不断深化,开展主要统计指标环比试算,提高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标准和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起点。统计管理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理顺和规范国家抽样调查任务工作机制。

国家统计局不仅在制度创新上下功夫,而且在统计工作规范统一上取得明显成效。国家统计局健全了统计标准,修订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制了《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颁布了《统计用区划代码》和《统计用城乡划分代码》,完善了企业划型等标准。同时,加快了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初步建成满足规模以上工业、资质内建筑业、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常规统计调查所需字典库。认真组织实施企业调查一套表制度试点,初步实现对企业调查的统一设计、统一标准、统一调查单位、统一布置。完善并推广统一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初步设计能够满足各专业统计和各项普查需要的国家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积极规范统计流程和调查行为,健全各主要专业统计业务操作规程,完善主要统计指标数据质量全过程控制办法。

数据的真实,除了统计机构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人民的参与和监督。马建堂告诉记者,以“统计和您在一起”和“走向公开透明的中国统计”为主题,国家统计局组织了首个“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与联合国经社部统计司成功举办第一个“世界统计日”全球性庆祝活动;编写《中国主要统计指标诠释》等大量统计科普读物,宣传统计法规政策、统计制度方法和统计工作,及时发布统计信息、数据,认真做好答疑解惑工作,使得统计公开透明取得重大突破。

不断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

“2011年,不断提高统计能力、

统计数据质量和政府统计公信力,进一步推进统计工作规范统一、改革创新、公开透明,着力建设基本单位名录库、企业调查一套表制度、统计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联网直报系统‘四大工程’,将是统计部门工作的主攻方向。”马建堂说,我们将积极推进基本单位名录库建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完整、不重不漏、真实准确、及时更新的基本单位名录库。推行企业调查一套表制度,加快建立满足各方需要,便于企业填报、减轻企业和基层统计机构负担的统一规范的企业一套表制度。推出统计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尽快建成满足各项统计调查全过程数据录入、审核、加工和上报,性能优良、便于操作的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积极推进联网直报系统建设,加快实现调查对象和调查人员通过互联网直接向全国数据管理中心报送原始数据、各级统计机构在线共享的工作模式。

当前统计工作备受重视,统计数据备受关注。社会各界要求统计部门不断提高统计能力,不断提高中国统计数据质量,只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政府统计公信力。鉴于此,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中国统计要更加改革创新,更加规范统一,更加开放透明的目标。

“统计部门将按照国务院关于统一核算地区GDP的要求,积极稳妥推进GDP核算制度改革。加快建

全面、协调的服务业统计调查制度,强化部门服务业统计。制定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方案,继续推进一体化试点工作。”马建堂说,我们还将实施新的住宅销售价格统计调查方案,确保住宅销售价格指数质量。正式建立主要统计指标环比制度,认真开展环比指数测算。改革劳动力调查,增加样本量,调整样本分布。完善工资统计制度,试点并逐步推进非私营单位的抽样调查。全面落实重要商品购销存统计制度,开展以各省或全国为总体的限额以下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抽样调查工作。

今年,统计部门将建立健全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的相关产业分类,修订《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加强统计基层建设,推动乡镇政府依法设置统计工作岗位。积极配合国务院法制办完成《统计法实施条例》的制定并做好贯彻落实工作,抓紧起草《民间统计调查管理办法》,制定并实施统计“六五”普法规划,强化统计执法检查。进一步健全统计信息化网络,启动原始数据库建设工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我国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

用法律来管理社会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管理新招岂能越线！社会管理的创新是一定要守住一条底线的，即法律法规的红线

我国在2010年如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吴邦国委员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庄重地说道。同时委员长也看到，“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委员长显然对现实具有非常深入的了解，目前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常百姓，确

实存在不少忽视法律的行为。由全国人大代表们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依法管理社会

目前，有一些基层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时，采取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晚解决或者不解决的思路，甚至花

钱解决纠纷，以非法制化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给国家的社会管理工作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

“不能单纯为了息事宁人而不依法行政，也不能单纯为了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而不依法行政，更不能单纯为了暂时迎合民众情绪和舆论压力而挑战法律的权威，触碰法制底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十堰市市委书记陈天会说。

陈天会表示，有大量事实证明，若以非法制化手段来解决问题，也许暂时可以取得维护稳定的效果，但很容易助长一些民众“不闹不解决”的心理预期。“有时候看起来原有的矛盾暂时化解了，但更多新矛盾又会出现，这使得当前的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陷入一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从而造成维稳工作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维稳的边际效益有逐渐递减的趋势。

“这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也同意陈天会的看法。他表示那些做法造成了老百姓产生在法律程序外更能解决问题的预期，“我们应该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尽可能地使人民群众产生的预期，是通过按照法律程序提出诉求就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应该尽可能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律程序来表达诉求、解决纠纷。”

“必须加强法制在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的指导作用。”陈天会认为，社会矛盾越是高发、易发和群发，就越要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法制建设成果，努力加强民众对法制的尊重

和敬畏,对于闹事群众的不法要求,不能以牺牲司法权威为代价过多地示弱和迁就。

吴邦国委员长提出,国家干部要“善于运用法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

行政和司法如何相辅相成

“一个纠纷,如果通过司法机关审判能得到10万元,而通过信访‘大闹大解决’,最后得到了20万元,那么司法就没有尊严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认为,目前许多群众希望通过“上访”而不是到法院诉讼来解决问题,出现“信访不信法”现象,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行政和司法的关系。他说,信访属于行政权力,判决属于司法权力,一个高效的维稳机制既需要行政力量也需要司法力量,但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对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规定,摆正司法和行政的关系,使两者有机互动。“要使社会从现在的静态稳定变成动态稳定再到长治久安,不能‘强行政弱司法’,否则就有损司法的尊严和权威,损害宪法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也表示,不能像有些地方政府希望的完全仅凭行政手段去解决社会矛盾。“很多群体性事件因行政机关而起,单凭行政力量处置,公信力有限,群众难以信服。”他认为应该多用司法手段,依靠法制的力量去解决。“特别是突发性的群众事件,比如在生产安全事故中,如果有作为第三方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及时表态、及时公布依法查处相应渎职犯罪,则有利于平息社会矛盾。”

通过调解解决矛盾纠纷是我国特有的传统,我国也正在努力构建大调解格局,大调解格局中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多个层次。“大调解格局对中国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非常有利。”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如是说,但她对目前一些地方法院追求“零”判决,或者以调解率作为法官的业绩考核标准等做法表示不赞成。“一定要调判结合,不能太过于强调法院的调解作用。”她表示司法作为维护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的“定纷止争”功能不但不能丧失而且要加强,不然法院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将会遭到质疑。

“哪些可以调解,哪些不应该调解,建议作相应规定。”王利明代表也认为,调解绝对不能完全代替了判决,必须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

改革和创新并进

“有人给我提供一个数据说,90%的法官出事都是在执行的时候,这是值得研究的现象。”王利明说。

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同时法院也行使对裁决的执行权,但现实中法院往往赋予执行法官实体裁判权,执行法官既是执行官又是裁判官。王利明说,司法权实际上是一种判断权,执行权是一种行政性质的权力,和司法在性质上并不完全符合,甚至有时跟司法权会有冲突。如果审判权和执行权集于一人,相当于法官既是“运动员”又当了“裁判员”,是一个司法腐败的风险点。

而且,“执行工作非常复杂,会大量分散法官的精力,使法官不能把更多精力关注在主要职能的审判工作上。”为此,王利明建议,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分离,即“审执分离”。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这是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做的明确部署。2009年3月,广东省法院系统在全国率先推行了执行实体审查模式改革,将执行程序中涉及到实体权力的审

查事项从执行部门剥离,统一交由审判部门负责,执行部门只能执行审判部门的裁决结果。这一改革得到社会广泛好评,“此举很好,有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还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法院的执行难问题。‘审执分离’应成为科学设置执行权的趋势。”广东省人大代表、律师朱列玉说。

对于创新社会管理,吕忠梅认为从司法方面入手可以有很多作为。她讲了一个小故事来说明:吕忠梅在日本考察学习社区的环境保护时,当问起如何搞好社区环境,当地官员和居民一致说要归功于法院和警察。原来,当地法院和公安部门会定期公布每个小区发生偷窃案件的数据,人们通过对几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了一个规律:凡是院子自身小环境做得较好的家庭,偷窃事件就少。因为院子整洁、花草美化漂亮,会引来行人驻足观赏,小偷没有了可趁之机。“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得到启发,站在不同方位、角度看问题,研究问题,这样带来的和谐稳定的效果可能远远大于简单地就某一件事做某一件事。”吕忠梅说。

总之,社会管理必须注重法律、政策、道德、宗教等多种形式的相辅相成与良性互动。“法律重在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和事后纠错,道德强调良心教化和事先预防;法律追求稳定与统一,政策讲究及时和灵活;宗教能帮助把外在的法律规则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内心自觉。”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封丽霞认为,只有上述诸多社会管理手段的有效配合,才能构筑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固防线。而且,政策、道德等也只有在合乎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并在法律所确定的领域之内才能发挥作用。

“社会管理是一门非常复杂的学问,我认为,再复杂也必须要通过法制来管理社会,这也是我们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追求的目标。”王利明说。✎

创新社会管理：行业协会何为？

文 / 本刊记者 梁国栋



图/CFP

2011年2月18日，由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复聪教育基金、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北京听力协会举办成立大会

以社会新阶层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樊芸，十分关注行业协会的发展。从事市场中介服务业的她，以发挥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题，同记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中国的行业协会，通过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新经济行业和非公企业。但从目前情况看，行业协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于创新社会管理的要求。面

临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挑战，行业协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事实上，关注创新社会管理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议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指出，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要求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十二五”规划纲

要设专章，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出规划。

在创新社会管理被提到更加重要的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作为民间组织形态之一的行业协会如何有所作为，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在接受采访时发表了富有见解的看法和意见。“行业协会要改革，要顺应形势。”樊芸认为，只有改革才能有效地发挥行业协会化解矛盾的作用。

加强党建是基础

今年春节前,威海成功发行“旅游一卡通”,将包括刘公岛、赤山等在内的14家景区打包销售。这项由威海市旅游行业协会党委在2009年推出的一项抓党建促发展的举措,不仅刺激了旅游消费,为市民带来了真正的实惠,更赢得了广大会员的拥护。

作为加强基层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许许多多的行业协会纷纷组建起了自己的党支部,组织党员开展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创先争优等一系列活动,赢得了好的效果。

“这表明,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代表们一致认为,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基层组织要发扬好的传统,把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作为日常“必修课”,长期坚持不懈地做。

但代表们也指出,加强新兴组织党建工作依然任重道远。“从实践来看,非公组织党建是属地化管理,党组织设在街道,这个办法是很好的,但对于高端服务业企业而言,由于跟街道交流很困难,缺乏共同语言,往往疏于党建管理,而且中介行业党建工作的行政化味道较浓,吸引力不强。”樊芸代表指出。

而这样的新兴机构也不在少数。全国人大代表黄兰香担忧地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新社会组织会不断涌现。“以汽车协会为例,不管注册与否,购买某一品牌汽车的车主都会经常以沙龙、俱乐部的形式聚在一起。”她认为,一旦他们中有人遇到问题,不能够得到妥善的解决,就有可能演变成大范围的矛盾和冲突。

因此,创新基层党建工作被代表们频繁提及。“现阶段,要加强党对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领导。”樊芸代表告

诉记者,应当进一步探索基层党建管理与行业党建管理有效衔接的体制机制问题。高劲松代表则指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坚持党委领导这一法宝,要发挥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政府负责,关键是要更加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落实好各部门的职责;还必须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发挥其作用。

改革是突破口

我国行业协会的长足发展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从事市场中介服务17年的樊芸代表说,在1999年的时候,为了迎接入世的挑战,根据国际惯例,中介机构要与政府脱钩,以便出具具有公正性和独立性的第三方报告。也是从那时起,中介服务企业的主体。进入市场后,中介企业没有了上级管理单位,行业协会就此应运而生。而它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绝大多数行业协会都与政府脱钩,做到了政企分开。樊芸代表认为,当前,行业协会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责,就是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在利益多元、诉求多样的时代背景下,为构建和谐社会出力,为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她举例说,最近发生的一起车祸,本身是个交通事故,但由于涉及拆迁,政府的调查结果不被信服,如果由律师协会调查并出具结果,可能就会平息事端,化解矛盾。

而要发挥职能,首先必须改革。“虽然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脱钩,但仍然成为安排富余人员和退养人员的场所,年轻人根本就留不住。”樊芸代表认为,目前,行业协会人员老龄化现象较为突出,体力和精力难以胜任行业协会的工作。她不无担忧地说,这些协会缺乏生机,难以作为,不具备处置社会矛盾突发状况的应急能力,缺乏凝

聚力和向心力,导致会员对行业协会信心不足,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有些行业协会,不能代表大多数会员,也难以成为会员的“代言人”,尤其很难保障中小会员的权益。她形象地说,某些行业协会就是开开会,收收费,搞搞联谊活动。

她建议,行业协会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同时要输入新鲜血液,要选派人品正、素质高、口碑好、专业强,有行业代表性的人员参加行业协会的工作,把他作为一项事业,留住人才,留住年轻人。

加强立法不能少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共44万家,此外还有24万家在各级民政部门备案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大量未登记的“草根”组织。

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热情相比,我国有关社会组织的立法就显得十分滞后。“目前,对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管理的法规性文件,仅停留在1998年颁发的社会团体管理条例,还有2007年国办发36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职能转变,但是对加强社会管理,没有过多的内容和笔墨。”樊芸代表建议,要加快立法的步伐,并在进一步加强调研的基础上,增加社会管理职能。

全国人大代表王树芬也持这样的看法。她建议,在国家立法层面制定出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明晰社会组织功能定位,引导社会组织有序承接政府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尽快修改完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分类出台行业协会条例、民办社科类研究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等单行法规。同时,建立社会组织优惠扶持政策体系,促进社会组织更好、更快发展。■

区域经济：从竞争走向竞合

文 / 本刊记者 于 浩



2010年11月25日，杭州都市经济圈第四次市长联席会议在绍兴市举行

2011年3月1日，浙江省政府发布消息，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十二五”中第一个新“特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十八章“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强调在以线串点，以点带面这一考量之下，从西部到东北地区，从中部到东部沿海，规划出“广西北部湾、关中—天水经济区、沈阳经济区、太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区域一体化、海峡西岸经济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等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据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国家级区域规划已达27个之多，而为何要在“十二五”时期布置如此多的区域战略规划呢？这无疑是中国转型的需要，更是对区域内各自为政、产业雷同、市场分割、恶性竞争现象严重；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缺乏相互协调；城市规划不能相互衔接，基础设施很难共建共享；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无法协作统筹等等弊端的一次再改革，目的是推动区域经济统筹发展，良性互动。

国家战略带动城市发展

“我理解的国家战略，就是国家给予新区最大的优惠政策——先行先试。

一方面，它让全世界看到了国家的战略方向，另一方面使新区有了‘国家战略’这样的金字招牌。这比给多少钱、税收减免多少都重要得多。”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滨海新区区委常委、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主任何树山说，成为国家战略就意味着各种资源的不断汇集。2009年，滨海新区的生产总值只有3000多亿元，到了2010年，滨海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5000多亿元。

“但不是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纳入国家战略的。”何树山认为，80年代初，以深圳特区为突破口，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是一种观念的变革；而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是国

家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进行的一种探索式改革;到了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国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每个阶段的突破点不同,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

国务院刚刚批复的《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余温尚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再次提到,要坚持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这样的利好消息,着实让浙江团代表兴奋不已。而对浙江来说,眼前的巨大经济效益就是3月12日下午,浙江省和交通运输部在京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投资总金额达650亿元。

由此可见,国家战略规划是稀缺资源,也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跳板。因此,争取国家政策就成了地方政府的“必修课”。

“我们最希望将曹妃甸工业区纳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把曹妃甸中日工业园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全国人大代表、唐山市市长陈国鹰在分组讨论时多次表示,整个曹妃甸新区的土地面积相当于两个香港那么大,再加上具备天然的深水港区和辽阔的腹地,使得曹妃甸新区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在“十二五”规划中,以曹妃甸为龙头的河北沿海地区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将大大拉动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竞争大于合作

对于像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区域,因为早就成为了国家战略,代表们对“十二五”规划中是否提出像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等变得不那么关心,反而焦虑的是如何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

2010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5472.83亿元,经济总量连续22年居全国首位,而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9个城市组成的珠三角区域的发展却又极不均衡。以佛山为例,2010年的生产总值仅仅是广州的一半;至于后面的珠海、江门、中

山大都是广州的十分之一。再看作为国家级经济特区的天津滨海新区,2010年实现生产总值5030.1亿元,区财政收入超千亿元,虽然经济成就显著,但带动功能依然不大。位于河北境内,围绕京津周围的32个贫困县自被称为“环京津贫困带”以来,时至今日,依旧存在。

“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促进地区之间良性竞争的重要手段。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趋势,竞争与合作成为共识。但囿于体制,跨行政区域发展仍然较难,实质性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仍困难重重。”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特别是在产业转移、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方面,没有合理完善的区域竞合体制,协调与合作成本将异常高昂,是无法彻底实现区域间各方双赢,甚至多赢。

对于“环京津贫困带”这个怪异现象,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陈耀认为,按照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核心区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对周边形成一个强大的带动作用,不可能形成“环京津贫困带”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人为形成的、体制上造成的一堵墙,表明行政效应不能跨越。

“实际上,各个区域尤其是他们的龙头区域,都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之后才是辐射。”何树山认为,位于新区内的天津港的辐射功能就在逐渐显现。目前,通达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港口,70%以上的货物吞吐量和50%以上的口岸进出口货物来自天津以外的腹地省区。通过高速铁路,天津和北京同城化之后,两个城市的资源互补得到进一步增强。

未来五年,统筹各方才能协调发展

“现在,跨行政区域的统筹发展仍然较难,实质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仍困难重重。”赵林中说,现阶段的区域一体化,并不是区域合并,而是要按照既不争位置、也不沦为配角的“区域互补”思路,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相关省经济产业

带规划要及时上升到国家层面。

赵林中认为,区域之间项目建设,牵涉到规划、土地、融资、环境等诸多方面,必须从国家、省级层面出发,建立和不断完善重大项目的协商推进机制和长效管理机制,加强区域合作,通过多地区互动、多部门协作的共同建设模式,推进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在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要积极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着力探索一体化发展模式。如路桥收费站(点)撤并、公交互连互通、有线电视相互落地、医保(社保)互认互用等,都需要建立跨区域经济与社保等互通的规范机制,以促进要素资源自由流动。”

比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打造首都经济圈,就涉及调整完善利益关系和生产力布局等重大问题,单靠三地自身协调,很难奏效。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发改委主任张工认为,国家应有相应规划来配套,加强权威性、约束性的指导。

“跟天津滨海新区相比,我们尽可能的是错位发展,但有些产业有竞争不是坏事,但是不能恶性竞争。像曹妃甸新区现已形成化工、装备制造、港口物流、钢铁、高新技术五大主导产业。”陈国鹰说,虽然与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功能有所相似,但完全不一样也是不可能。比如冷轧薄板、宽厚板、造船板等等,都是钢铁产业,但产业内部还要细分;像天津港和曹妃甸港的发展,我们是以煤下水为主。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长黄兴国在天津团开放日上接受媒体集体采访时也表示,天津作为国家金融改革创新的城市,在功能定位上,与北京、上海实行错位发展,并努力将天津建设成与中国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有专家指出,无论是西部、中部、东北,核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发展有特色、有优势的产业,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此外,互动也很重要,即各地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跨行政区域流动,实现合作共赢。■

农民增收：路径在哪里？

文 / 本刊记者 王 萍



王中和/摄影

人挖掘农业增收潜力,从整体上提高质量与竞争力;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努力建设从田间到餐桌、从原料到制品、从生产加工到消费者的一体化经营。

王中和表示,具体在“十二五”时期要重点实施好“四大工程”,一是百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工程,全市粮食作物总产量超过100亿斤。二是百万亩日光温室的设施农业工程,比如草莓、葡萄和花卉,既能增加农民收入,又能保障城市居民的“菜篮子”。三是百万亩玉米膜下滴灌工程。每年发展玉米膜下滴灌100万亩,预计2015年将达到500万亩,增产玉米35亿斤,还可照此发展节水土豆等,通过节水灌溉,既节约了水资源,又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了。四是优质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工程。通过建立节水饲草料基地,走少养、精养的路子,优化畜种结构,这样既减轻了环境对草场的压力,又走出了一条农牧民增收的路子。

从对几位全国人大代表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保证农业增收潜力挖掘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实现农业产业化,引导农民加入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通过推广农业合作社等形式加强农产品基地建设,新建、扩建一批市场潜力大、加工增值高的原料型农产品生产基地,大力推行原料规格化、质量标准化、品种专业化和生产规模化。

“农民工”增收的出路在哪里？

王中和告诉记者,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之基。“十二五”期间,在保证农牧民从发展农业和牧业中获得收入外,

今年是我国“十二五”开局之年,已获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查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农民增收的潜力、动力、空间和路径在哪里?

保障“年增7%”的措施在哪里？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任正隆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基于农业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现实,比较效益偏低矛盾仍然突出。“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5年要巩固提高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这是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保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7%以上的重要一环。

那么,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将如何增长?任正隆表示,现在粮食价格太低,粮价回归常态有利于发展农业现代化和农业规模化经营,从而实现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今年他提出的一份建议就是关于解决粮食价格倒挂的。他在建议中提出,国家在5至10年内要逐步提高粮价,同时加大对粮食的补贴。

但是,现有的粮食价格体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大幅度调整。如何深入挖掘农业增收潜力,面向市场调整农业结构?

全国人大代表、赤峰市委书记王中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后5年,赤峰将通过转变农牧业发展方式,加快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着力解决农牧业大而不强的问题,解决农牧民增收难的问题,要深

赤峰同时还将加大农牧民的培训力度,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的二、三产业来就业,减少农牧民的数量,进一步扩大农牧民的工资性收入。

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台阶,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时期之一。去年,我国农民收入13年以来增速首次超过了城镇居民,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7.8%,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0.9%。

事实上,正如王中和强调的,农民收入增长加速的最根本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保持了非常快的速度。在2005—2009年,农民增加的收入46.7%来自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靠促进农民转移就业,并合理稳定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

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农民工工资持续快速增长的新阶段。自去年以来,我国已有30个省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大部分省份的调整幅度在10%左右,一些地方甚至达到25%以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获益最大的群体就是处于城市经济发展底层的农民工。

惠农政策在哪里?

“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大力增加转移性收入,进一步完善惠农政策,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加大扶贫投入,提高扶贫标准。

对于农业补贴政策,辽宁凤城市大梨树村的农民代表毛丰美对此也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十一五”我国农村发展形势很好,费改税之后,农民几千年来交“皇粮”的历史结束,现在中央给的补贴也比税多,但粮价太低。“改革开放30年,城里工资涨了50倍,粮价只涨10倍,全国9亿农民收入跟城里越拉越大!”“日本给农民的补贴是60%,韩国是50%,欧盟40%,都是政府给补贴,咱们是1%!把家电下乡补贴、农机具补贴都算上,才7%!”毛丰美理解地表示,粮价

涨不起来,是因为直接影响上游消费品的价格。今后5年,应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补贴力度,增加补贴资金,实现小麦、玉米、水稻全覆盖,并将农机具补贴实现农民群体全覆盖。

毛代表在和其他代表讨论时表示,国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取消对农产品价格的过度限制,通过价格的提高增加农民的收入,让更多的农民能安心务农。同时,限制农用物资涨价,通过给予农业物资生产企业优惠税收等措施,限制种子、化肥、农药、农机等农资价格,确保农民不因种植成本涨价抵消农产品价格提高带来的收入。

任正隆则表示国家应把补贴资金集中起来使用,重点用于扶持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如水利、农业科技、良种推广等农民个人无法投入、也投不起的地方,而且要投到真正贫穷的地方。

同时对于农村金融滞后影响农民增收致富的问题,毛丰美提出建议,“直到现在,农民贷款利率还那么高,农民存款利息为什么和城里人一样呢?农民享受不了低利率贷款,希望政府能尽快帮助解决,这是农民的切实需要啊!”

农民增收思路之“辩”

作为农业科学家的任正隆非常关注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农民如何增收也有自己的设想。

针对记者提出的农民通过土地增加的收入十分有限的现状,任正隆指出,农业走规模化经营的道路将是未来农民增收的发展方向。因为规模化经营会产生“种粮大户”,这样农民种田也能致富。

但同时任正隆也指出了现在农村发展农业存在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老人,很多新技术、新品种、新模式难以推广,再过十年,谁来给中国人种粮吃呀?这可不是杞人忧天!”

任正隆告诉记者,现在,大批农村人才外出打工,正好为农业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前提条件与机遇。不过,农

村土地集中、适度规模经营,都需要更高素质的农民。

毛丰美这位来自农村基层的人大代表对于破解农民增收问题的愿望更为迫切,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农民增收的问题。

“我认为,农民要富裕,必须发展二、三产业,把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来谋生,并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毛丰美所在的辽宁省凤城市凤山区大梨树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兴办乡镇企业,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在我们那里农民都叫‘业余农民’。早晚下地劳作,白天在企业上班。”毛丰美说,村里的劳动力都是“亦农亦工”,他们村村民现在人均年收入已达1万余元,显然,毛丰美对这一成绩还是满意的。但他也指出,中国大多数农村依然贫穷却是现状。

毛丰美还有更多的思考。他表示,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不能一味让农民出去,更要考虑怎么让他们就近就业,出台更多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返乡就业、创业。“实践证明大部分三四十岁劳动力都在农村,走不出去。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进城。其实一些老板更愿意在农村投资,因为四五十岁的劳力工资要求不如年轻人高,他们还不耽误下地劳作。所以就地、就近解决富余劳动力是个好想法,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到农村办厂。”

为了给农村推广经验,他向记者展示他带到这次大会上来的当地山区盛产的蚕茧和茧蛹。他说,当地90%以上的蚕茧被割开取蛹,蚕茧都白白扔掉,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如果有人投资,剩下的蚕茧可以就地加工成蚕丝被或用于制衣,价值大大提高,还能安置很多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给农民增加收入。

事实上,任正隆和毛丰美所强调的,也正是“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两个途径。随着农村以专业种植户、养殖户等为代表的现代农民越来越多,相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投入到二、三产业工作中。■

“驱动”科技创新

文 / 本刊记者 李小健



3月9日,在主题为“创新驱动、跨越发展”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上,“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引人注目

2011年3月8日,主题为“自主创新,重点跨越”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在北京开幕。在此次展览上,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悉数亮相:国产大飞机C919大型客机、“神舟七号”返回舱、“嫦娥三号”着陆器和月球车、下潜深度可达3759米的“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

这些骄人的科技成果,表明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尤其是在重大科技项目领域,对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对此,“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记者就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问题采访一些全国人大代表时,大家普遍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长久之计。

但同时,我国整体科技创新体系仍不成熟,缺乏活力,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问题之一就包括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依然严重。

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得先“驱动”科技创新。

扶持创新主体“上位”

“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加大政府科技资源对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

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华宇集团董事长赵华山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大为支持。他说,经济发展和转型,一定要以科技为主导,就国家层面来说,主要是主持大型科技项目、确立科技政策导向及完善政策机制。“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尤其是成果产业化中发挥的作用是无法取代的,这个事情,光靠政府来说是做不好的。”

全国人大代表、齐鲁石化研究院院长长达建文认为,建立企业主导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非常好,非常有必要,“如果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强化,就会造成科研院所和高校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就难以形成生产力和经济效益。”

实际上,在国际上,企业往往都是各个领域科技创新的主要力量。但是,在我国,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

为何企业对科技创新兴趣不大?全国人大代表、龙芯首席设计师胡伟武向本刊记者道出了其中缘由:我们国家以前的经济发展,对科技需求不是很旺盛,许多企业在粗线条经济增长中,投资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搞土地开发及热衷虚拟经济,就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谁也不愿意加入科技创新这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

全国人大代表、巢湖市副市长罗平也表示,现行体制下,短缺经济、快餐经济使许多企业无须技术创新也能生存发展,甚至获得不菲利润,导致企业对科技

创新缺乏重视,也不愿承担创新成果应用带来的风险。

“目前不少企业规模大、技术强、管理先进,具有很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完全有能力在国家重大项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认为。

不过,胡伟武代表认为,随着国家大力倡导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明确科技创新的导向,陆续出台利好的优惠和鼓励政策,未来5至10年企业必将会逐渐成为创新的主体地位。

搭建科技转化中介平台

挖掘和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作用,代表们认为政府不仅仅要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搭建具有共性的高水平技术支持平台,更要鼓励发展科技中介服务,为科研成果广泛走向市场、广泛应用,转化成生产力,营造便利和多元的环境。

罗平代表认为,让企业与科研院所实现灵活的无缝对接,必然需要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他建议,政府应加强建立健全以产业和企业为服务对象,以技术交易、咨询、评估、推广为内容的科技中介服务网络。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和科技创业园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信息、孵化、创业的全方位服务。

同时,科技成果转化首先离不开资金支持。除了政府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之外,还应进一步拓宽资金投入渠道,逐步建立以政府为导向、企业为主体、各种投资者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提供资金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院长相里斌表示,近年来,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满街到处都是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可谓功不可没。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同样需要大力发展科技中介服务,“要让科技中介公司像房地产中介公司一样多”,用市场的办法来激活科

技创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

科技人才应纯做技术研发

科技创新,人才第一。

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都特别强调要全面加强人才工作,“以高层次和高技能人才为重点,加快培养造就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加大人才开发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改革,努力营造平等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但是,一个大家都看到的现实问题是:现在科研院所许多科技人员主攻的不是技术研发和创新,而是跑关系找项目,发论文评职称,急忙升官。

科技人员当官之后,哪还有时间去搞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南京三乐公司研发中心设计师汪春耘向记者讲起他自己的故事,“前几年,公司领导提拔我当研发中心负责人。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脑子不够用,常常在冥思苦想一个课题时,一个电话过来,让我去开会。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你得马上把自己的思维从课题里拔出来,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为了专心搞科研,汪春耘辞掉了行政职务。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许志琴说,“上世纪60年代我刚进地科院工作的时候,有一项制度叫保证科研人员有六分之五的科研工作时间。然而在现行体制下,许多科学家被‘执行率、工作量、汇报、设计’压得透不过气,要花很多时间去应付科技管理方面的事情,科学研究缺乏起码的时间保证。”

汪春耘代表认为,“今后,申报科研项目,一定要严格把关,少点官员,多点坚持创新的科研人员。”

关键是,科技人员升官之后,拿重大课题经费就容易多了,这对于工资水平不高的科技人员来说,是一个挡不住的诱惑。“对此,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的

投入,尤其是要注重对科研人才的投入。”相里斌代表建议,应允许在科技项目经费预算中列入不超过30%的费用作为人员经费,以改善科技人员的待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社会上受到尊重。

许志琴代表希望,能够通过加强科研立法,洁净科学殿堂。建立科研诚信,建立严格的评审和评奖体制,惩处科研腐败,给科技工作者营造一个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完善扶持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建议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扶持政策。

她说,“国家对申报的科技创新项目,要有针对性、选择性,重点支持那些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产业水平的国际领先项目,使科技创新成为‘调结构促转变’的‘发动机’。对科技项目的扶持资金无论是补贴还是奖励,应突出重点,改进目前的甄选方法和评判标准,把钱用在刀刃上,最大限度发挥资金的扶持作用,提高自主创新的效率。”

“我认为我们国家的自主创新需要一种新的机制,这需要新的法律来保障。”邓中翰代表提议,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阶段,对自主创新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建设创新型国家、走向强国的行列必须要靠自主创新。因此,我国应尽快制定自主创新法。

他表示,如今各地包括高新区、中关村示范园区都在尝试以无形资产入股作为新的激励政策,这种政策其实没有直接的法律可依,因为公司法要求必须以钱来入股,无形资产入股尚无法律明确规定。通过制定自主创新法,明确保障自主创新人员的股权,明确他们的利益分配和知识产权。从国家标准层面和知识产权保护层面,甚至贸易摩擦的层面对其进行保护、立法。自主创新法既要涵盖各种权益的问题,又要涵盖科技体制创新的问题,反映国家未来大的方向是依靠自主创新来实现科学发展。■

专题调研：让履职跃然生色

文 / 本刊记者 王聪颖



山东省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日照市就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进行专题调研

去年春夏秋三季，各地人大常委会组织当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兵分多路，深入基层，通过实地走访、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等方式，与基层群众“零距离”交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镜头画面”切换至首都北京：2010年，北京市围绕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和“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两个调研题目开展专题调研。在“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调研组里，图娅、王天佑、刘忠军三位来自医疗系统的代表作为召集人，结合自己工作中的实践经验，制定调研方

案，提出调研需要了解的重点问题。从选题、组织，到活动方式上，代表们都被赋予了更多自主选择的权利。通过这样的调研，不仅增强了专题调研的针对性，同时也提高了代表履职的积极性。

据统计，2010年一年，共有近1900名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调研，形成调研报告近100份。对于2005年中央9号文件启动的这项代表活动的有益尝试，全国人大代表们纷纷欣喜地表示，专题调研使他们履职的舞台更加天宽地广。

突出重点，选好题目

2010年，全国各省、区、市人大常

委会紧紧围绕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等选题，开展了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专题调研活动。

福建省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为调研总课题，确定了“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节能减排”等四个子课题。河南省确定了“大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推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调动多方力量化解社会矛盾”等调研题目。浙江省围绕“浙江省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提升工作情况”开展调研。

宁夏回族自治区则是抓住制约宁夏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瓶颈”问题，围绕关系南部山区群众生产、生活的民生问题，对近年来宁夏代表团提出的关于饮水水源工程、节水工程建设等重点建议办理落实情况进行了调研。

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二五”的奠基之年，意义重大，任务艰巨。因此，地方人大在开展代表专题调研活动时也结合了国家编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主题。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围绕编制“十二五”规划中的经济结构调整、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发展等问题确定了调研题目。上海市将世博主题、“十二五”主题和专题调研紧密结合，确定了“促进重点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化”、“发挥‘低碳世博’效应、促进低碳发展”等旨在推动经济结构调

整、发挥后世博效应的题目。

此外,也有部分省、市立足于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有的放矢”地开展了专题调研。天津市结合本市开展的“解难题、促转变、上水平”活动,围绕加快经济方式转变、提升城市建设和管理水平,确定了“关于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在城市建设中保护文化传统和地域风貌”等题目。

山西省则紧扣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就“关于山西煤炭循环经济园区建设情况”等开展调研。海南省围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对海南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云南省结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国家面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的建议”,对德宏州、红河州推进桥头堡建设情况实施了调研。青海省在玉树地震发生后,迅速组织代表深入玉树灾区开展调研,全面了解灾区群众安置和恢复重建具体情况。

精心组织,保障有力

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对专题调研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和支持,细化方案,落实任务,责任到人,从根本上保证了专题调研工作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欧广源,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云耕等领导同志带头分赴实地与全国人大代表们一起进行调研。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任海深、副主任朱维芳,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坚卫,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世礼,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晏友琼,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新杂·单增曲扎等领导同志亲自担任调研小组的召集人。

福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春兰,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乐际审阅了代表专题调研方案,

作出批示。山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专门听取汇报,提出要求。安徽、河南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对专题调研工作进行了专门研究。天津、吉林、江西、广东等省市专门召开了工作会议,研究部署调研工作。

通过开展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的形式,不仅拓宽了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参与常委会活动的渠道,而且还使地方人大常委会能够及时发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解决建议,确定应对策略,进而发挥好代表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先进带头作用。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人大对专题调研活动也是早计划、早安排,并在调研组织方式上进行了有益探索与创新。河北、甘肃等地从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就着手准备专题调研工作,征求代表对调研选题和调研安排的意见。山东、甘肃等地采取了省人大常委会组织的重点题目调研和各小组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分期分批开展调研。甘肃省在安排部署调研时,还明确提出代表要围绕调研的问题准备个人调研提纲,做到调研前对有关问题和重点心中有数;代表开始调研前进行集中,由调研组负责同志明确本组调研的重点、难点、方

法,提出要求。

广东、上海采取了代表报名与自选题目的方式,根据部分代表要求,分别组织了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和对“完善民事再审制度、进一步维护司法权威”的调研,增强了专题调研的针对性,提高了代表调研的积极性。福建、江西两地遭受特大暴雨洪水灾害后,及时调整调研时间和调研地点,保证了调研的顺利进行。

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每个调研组由2个代表小组组成,采取集中听取汇报与分别调研相结合的方式,兼顾了调研组在活动内容和地域上的便利,增强了调研的灵活性。同时,广西还在各个调研组的服务指南中提出与调研题目相关的思考题,帮助代表有针对性地收集资料 and 了解情况。陕西省各调研组在调研开始前分别召开会议,根据专题调研总体要求、目标任务和具体情况,细化每个小组的调研日程,明确重点环节。

与此同时,各地人大常委会在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方面也下足了功夫,确保调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江西省人大常委会选任联工委多次与省政府办公厅、省发改委、省水利厅、省环保厅等部门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徐州市泉山区调研

泉山区人大代表提供



摄影/曹路燕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在社区警务室调研

主动沟通联系,专门召开协调会,完善工作方案,细化日程安排和服务保障工作。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两次邀请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发改委、省社科院等单位,就组织代表围绕桥头堡建设进行专题调研问题听取意见和建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联络室积极拓展服务范围,在实地调研开始前,为代表搜集、编辑了《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文件汇编》、《住房保障政策汇编》、《国外住房政策概述》等文件材料,便于代表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研究相关的法规、政策,在调研中更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和建议。

充分发挥代表履职主动性

为了保证代表能够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专题调研在题目的选定与形式的选择上,要注重民生细节,扎根基层实际。通过充分调动和发挥代表参与调研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进一步保证人大代表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和要求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对此,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听取调研单位有关情况汇报和介绍40多次,实地察看国有大型企业、学校、基层医疗卫生院所、社区、农村村组、重点

建设项目工地等60多处,召开小型座谈会7次。甘肃省人大常委会组织3个调研组深入山区、草原、戈壁,深入乡村、农户,深入政府部门和企业事业等80多个单位,召开各种规模的座谈会30多场,走访群众100多人次,直接听取群众意见。

专题调研也充分发挥了调研小组召集人的作用。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在安排调研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上,全部由代表推举的召集人根据大多数代表的意愿最终确定,并尽可能照顾到每个代表不同的个性化需求。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江平镇万尾村党支部书记苏明芳选择参加了“维护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专题调研组。在调研过程中,他深入、细致地了解有关政策和边防情况,认真向当地边民宣传国家的法律、法规。苏明芳代表还利用语言互通的便利为调研组成员走访边民提供翻译和解释,增强了调研工作的实效性。

调研活动收效显著

专题调研不仅丰富了代表知情参政的内容,扩大了代表对常委会活动的参与,更为代表在会议期间做好各项议案和报告的审议工作提供了必要条件

和切实保障。

专题调研结束后,各地安排专门时间组织代表召开讨论会和总结会,代表们在深入调研、充分讨论、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批数据翔实、材料充分、分析透彻、建议明确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涉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和谐社会、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文化建设等十个方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对于推动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通过专题调研的形式,地方人大常委会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代表日后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打下坚实基础。新疆代表通过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情况进行调研,形成了1件代表建议。福建代表通过调研全面地了解福建省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专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提交了“关于在漳州市设立国家级高新科技园区”等5件代表建议。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在制定专题调研方案中,特别强调专题调研要与代表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了“关于国家铁路、高速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本金由国家承担”、“关于解决瀑电库区塌岸滑坡治理与内安移民后扶等重大问题”等13件代表建议。

代表们通过深入基层,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直接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密切了代表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代表们也把了解和掌握到的情况及时反映给当地有关部门。既肯定成绩,又指出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对有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赵治海：用“张杂谷”添满更多饭碗

文 / 本刊记者 于浩



赵治海

的这种杂交谷子的主要特性就是耐旱。”赵治海说，尤其是现在的环境变化多端，本应该是下雨的季节可能不下雨，或者下得很少，这都对农作物的生长产生很大影响。因此，从需水角度看，生产同样1克重量的粮食，大米需要水大约470多克，玉米需要370多克，谷子需要270多克。

“现在‘张杂谷’在中国的实验已经成功，我们下一步打算到非洲一些国家做试点，并逐渐推广。”赵治海说，非洲许多国家和中国的地理环境差不多，我们打算在非洲建立一个杂交谷物研究所，逐步研发更加适合非洲种植的谷子品种。

回想起研发“张杂谷”的历程，赵治海说像过电影一样，历历在目。

1982年，赵治海毕业于河北农业大学，那时大家都不乐意去搞科研，而他却很喜欢在实验室里鼓捣瓶瓶罐罐。“那时也不知道什么是科研，只是觉得把时间浪费在玩上，还不如多搞些实验。”而这样的实验，赵治海一做就是12年，直到1994年，谷子光（温）敏型雄性不育系“821”选育研制成功，给处于困境中的谷子杂交种研究带来了新的希望。2000年，世界上第一个谷子光（温）敏两系杂交种“张杂谷1号”诞生，它比常规种子亩增产30%以上，最高亩产突破了600公斤。2004年，选育出世界

上第一个谷子抗除草剂杂交种“张杂谷2号”，解决了谷子除草费工的世界性难题；2005年，解决了谷子杂种优势应用的关键技术，谷子杂交“制种”产量提高到亩产300多斤；2006年，国家一级优质小米“张杂谷5号”在张家口下花园区创造了亩产660公斤的谷子高产新纪录；2007年单产再创新高，最高亩产达到810公斤。

2010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河北代表团的审议。当听到赵治海代表研发培育的优质杂交谷子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大力推荐，在全球干旱地区推广种植时，温总理对农业研发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鼓励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为农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张杂谷’已在河北、山西、河南等11个省份推广种植400多万亩。”赵治海说，在今后地下水开采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恢复谷子的生产是必然趋势。希望未来10至15年，杂交谷子在全国的种植面积发展到1亿亩，那样就可以为国家增产粮食400亿斤，这对中国的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而每年至少可节水100亿立方米，对我国农作物地区的缺水现状也是个缓解。”

赵治海表示，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必须要为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出点力。但赵治海也有着自己的忧虑，自己大学毕业分到张家口市农科院时，数百人在搞谷子的杂交研究，而现在搞研究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未来谁又能为中国农业科技撑起一片天呢？

“我刚刚把5公斤的‘张杂谷’种子送给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塞奇托莱科女士，她说想回乌干达再继续种些谷子。”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农科院谷子研究所所长赵治海告诉记者，他们把张家口市农科院研发出来的杂交谷子叫做“张杂谷”，现在谷子已经开始在非洲的土地上落地生根了，也许非洲由来已久的粮食问题，会因此得到缓解。

“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种子解决了中国人养活自己的问题，但水稻主要是种植于我国南方，在北方，尤其是西北这种干旱地区，种粮食是需要开采地下水的，更别说种水稻了，而我们研发

黄藤：公办、民办教育一起发展

文 / 本刊记者 李小健

连续两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事学院院长黄藤几乎每年都会为促进民办教育发展建言。

黄藤代表认为，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我国民办学校教师达数十万之多，辅导数百万学生，这些民办学校教师与公立学校教师一样，肩负着为社会为国家育人的重责。希望国家给予足够重视，尽快将民办学校教师的工资纳入国家财政补贴范围，保障他们的利益，促进民办教育长期健康发展。

黄藤代表认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为民是最根本的，“我们提的每条建议，都要有一种高度负责的精神，真实客观地把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转达给政府，以供政府决策参考。”

而之前，作为民办教育界为数不多的代表，黄藤一直为民办教育鼓与呼，向国家层面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关于将义务教育阶段民办中小学中符合“两免一补”条件的学生纳入政策资助范围的建议》、《关于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的建议》等等，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在众多关乎民办教育发展的建议中，最令黄藤代表满意的就是一——关于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学生享受同等国家奖助学金待遇的建议。由于黄藤代表与其他代表的努力呼吁，直接推动了国家奖助学金覆盖民办高校政策的出台。2007年年底，全国民办高校大学生第一次公平地享受到了国家奖助学金。在校民办大学学生个人最高国家奖学金达8000元，奖助学金范围覆盖到了全国将



摄影 / 李小健

近三分之一的民办大学统招生。

对此，黄藤代表表示，“推动国家奖助学金向民办高校延伸，这一结果的确非常令人鼓舞。但我更看重的是这一利好政策所体现出的难能可贵的教育公平理念。”

谈到教育公平，黄藤向本刊记者表示，相比以前，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很大进步。尤其是近几年来，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在不断增大，投向农村的教育经费也逐年增多，建了许多新的学校，师资配置更加集中。

“教育事业整体得到发展的同时，我们应看到出现的新问题。”黄藤代表话锋一转，拿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区域之间的教育差距在拉大，区域内部的教育差距也在拉大。”大家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教育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东部的教育水

平提升得更快，这是西部无法企及的。在西部区域内，中等以下学校和最差学校的距离在缩小，顶尖学校和一般学校的距离却在不断拉大。他举例说，在西部，同样是免费的公立小学，教学条件差的，大家都不愿意把子女送过去；教学条件好的则不同，找领导批条子交好几万赞助费，也要把孩子送进学校。

他认为，尽管这些年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但民众仍感觉到上学难、上学贵，实际上体现为择校难、择校贵，这主要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造成的，“同样是公立学校，教学水平却相差过大，政府用公共资源提供不平等的服务，这是最不应该的。”

黄藤代表表示，破解教育不公，政府必须要厘清思路，加大投入，公平与选择兼顾，公立教育满足均衡，民办教育满足选择，就像过去提的“公办不择校，择校上民办”，“应该建立多元的教育体系，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一起发展，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除了关注民办教育发展之外，黄藤代表还十分关注民众所关心的其他事情，比如今年他还提出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全国中学增设汉字书写课等多件建议，比如2008年与其他代表一起提出关于制定吸烟危害控制法的议案，已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对此，黄藤代表表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不仅要关注自己单位、自己省里的事情，更要站在全国、全局的高度，关心全国人民之所想，关注全国人民关注的事情，特别要架起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一个桥梁。”

贾伟平：慢性病治疗应放在社区医院

文 / 本刊记者 梁国栋

全国人大代表贾伟平“三句话不离老本行”。身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院长、内分泌代谢科教授、糖尿病方面的专家，她认为，“目前，公立医院改革进入了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她说，2010年，上海卫生行业完成了1.9亿人次的看病量，这是上海2100万常住人口的9倍，其中社区承担了40%的任务，完成了7600万人次，二级以上医院完成了1.4亿人次，比2009年同比增长了10个百分点。

医生工作负荷量这么大，而群众依然感到看病难。”贾代表认为，在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前，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缓解百姓“看病难”问题。因此，她提出慢性病治疗下基层的主张。

“就上海的大医院而言，六七成的患者是前来看常见病的，比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贾代表说，按照慢性病管理规定，这些慢性病治疗是要下沉到社区医院管理的，但为什么这些病人绝大多数由二级以上医院承担，这是因为我们的老百姓对社区医院的服务能力不是很信任。

“确实，三级医院与社区医院在控制疾病上是无法相比的。”贾代表再次用数字证明自己的观点，比如，社区医院对糖尿病进行控制，好的

控制率只有10%左右，但在三级医院可以达到50%到60%。对社区医院的不信任，导致病人纷纷前往大医院就诊。在贾代表看来，这就使得病人挂号难，挂专家号更难，由此产生“看病难”问题。同时，在上海，根据药品分类定价规定，在社区医院就诊，个人负担10%，在三级医院就诊，个人就要承担30%，“所以花费就贵，看病贵了。”贾代表说。

数据显示，在中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心脑血管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疾病的患病人数已有约2亿人，因慢性病死亡的人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因病死亡人数的80%以上。就此，贾代表提出，必须加快基层医院的建设，使慢性病治疗下沉到基层管理。

“80%的慢性病可以防，80%的慢性病可以治。”贾代表认为，关键是要及早发现及早控制。“在临床，很多糖尿病人等到眼睛看不见了才来就诊，耽误了就诊的好时机。”贾代表认为，只要加强对基层医生的培训，使他们提高对一些慢性病诊疗和控制水平，是可以实现有效控制慢性病的目的。

“而且，社区医生与病人更加熟悉亲切，便于医患之间沟通。”她举例说，“我们曾经深入上海普陀区的三个社区医院，为医生免费提供三个月的糖尿病治疗培训，使他们成为治疗糖尿病的骨干。结果发现，每



摄影/梁国栋

个社区医生一天接待70到100个病人，病人管理也很好，血糖控制很好。如果遇到疑难病症，就直接转诊到专家门诊。”她对这个模式评价颇高，一方面使得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同时，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短期培训是治标之策，治本之道还在于让更多的全科医生在基层医院开创自己的天地。“对于基层医院而言，能够真正掌握看病技能的全科医生是需要补充的。”贾代表认为，政府应该为基层医生搭建他们事业发展的平台，通过提高待遇水平、社会认可度，以及解决职称晋升问题，来让更多全科医生愿意在基层干事业。“作为医生来言，在社区也可以成为名医。”贾代表说。✘

高洪：应改变“零敲碎打”式扶贫

文 / 本刊记者 张维炜



摄影 / 张维炜

他告诉记者，每年他都要到许多民族地区进行调研，“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包括广东省的连南瑶族、连山壮族瑶族，以及乳源瑶族这三个民族自治县，我们都去过。”2010年，为了配合国务院关于民族经济发展的报告的审议，高洪参加了全国人大民委组织的调研，前往四川的阿坝州和凉山州调研，其间又转战贵州的黔东南州、重庆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等多个民族地区。

调研中，高洪代表看到经过“十一五”期间的不懈努力，民族地区经济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发展势头，“我们无论走到哪里，百姓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都对党和国家心存感激。”高洪说。

但是高洪代表也明显地感受到民族地区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还是脱贫致富。“有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在广东这样发达的省份，也有一些贫困的民族自治县。”“有些民族地区的贫困程度甚至非常深。”高洪向记者分析道，贵州、四川、重庆三省市民族地区的贫困，是恶劣的

自然条件、薄弱的基础设施、滞后的社会事业、历史的欠账、自我发展能力的严重不足等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所致，是综合性的贫困，而且往往呈集中连片贫困分布的特点。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创新扶贫思路。”高洪代表说，“十一五”期间，国家对民族地区采取的是“整村推进式”的扶贫方式，已经取得成效，但只是局部性的，对一个民族贫困地区的发展来说，更需要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集中、整合各方面的力量，改变零敲碎打式的扶贫方式，实行县以上区域性整体推进的方式。

扶贫的重点是什么呢？高洪强调，就是国家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注重扶持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实现“输血”与“造血”并举。“这个特色是与众不同之处”，高洪举例说，比如云南多数山区生态环境脆弱，绝对不能发展重工业生产，而利用生物资源和气候多样性发展蔬菜、花卉、干果、水果等绿色特色产品却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四川阿坝州的畜牧业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巨大的生产潜力。因此，打造这些“拳头”产业，需要建立养殖、种植、产品深加工、市场拓展等产业链，需要国家有一系列的规划，真正帮助这些地方脱贫致富。

在采访的最后，高洪对记者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加大边疆、民族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扶贫力度，希望能够尽快得到细化落实。✘

“新阶段民族地区的扶贫，面临的都是如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地区、高寒地区等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最难啃的‘硬骨头’，应改变零敲碎打式的扶贫方式，实行县以上区域性整体推进的方式。”全国人大代表高洪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提出这样的观点。记者听他讲述了这些建议背后的故事。

高洪是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不仅如此，作为云南农业大学教授，农牧学方面的权威专家，他还是连任两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身份、专业领域的特殊性使他更关注民族地区“三农”经济的发展。

周森：慈善事业亟待有法可依

文 / 本刊记者 刘文学

关于慈善立法的建议,当了四年人大代表的周森已经呼吁了四年。

周森是中国三峡画院的院长,以“中华左手反书第一人”称誉书画界。同时,他出名的还有他那慈善家的头衔。二十多年来,周森为慈善事业捐助的资金达千万之巨,先后被河南慈善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河南省十大慈善新闻人物”、“中华慈善大使”、“世界和平奖”和“联合国和谐友好使者”等称号,并荣膺“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周森的公益善举可以列一个长长的单子。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他捐赠了价值300余万元的书画;2010年4月,随“甘露使者慰问团”前往贵州黔东南自治州送钱送水;今年2月20日,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100万元成立周森爱心基金,并由周森爱心基金向北京门头沟凯迪实验幼儿园捐助了10万元的教学用具。

回顾二十年来为我国慈善事业所做的努力,周森百感交集。一直行走在慈善事业路上的周森看透了慈善事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社会捐赠资金在管理、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资金的安全性还存在隐患;有的部门把社会自愿救助捐赠活动转为变相摊派,挪用甚至侵占捐赠款;有的社团组织以捐赠为名从事营利活动;一些企业借“慈善”之名,行“宣传”之实,出现事前“承诺”、事后“赖账”的捐赠,甚至出现借捐赠名义行骗、促销等违法行为;部分基金会对资金的筹集、捐赠项目和资金的投向未能如实地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摄影 / 刘文学

他认为,目前慈善事业存在种种问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无法可依。于是,自从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就开始大力倡议慈善立法。而且,随着他每年思考的问题不同,他的建议有不同的侧重点。

2008年、2009年,他的建议侧重慈善文化的培育。他向大会提交的建议是《关于发展慈善文化事业与开展慈善教育的建议》。他说:“我国很大一部分公民,对慈善事业的理解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对慈善事业了解得不够全面,在慈善文化知识的教育、普及工作上还有一定的缺失。”他建议“将慈善文化教育作为中小学一项最基本的思想道德文化课”。

2009年,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诈捐”、“裸捐”事件,于是周森向2010年大会提交了《关于提高慈善公益事业公信力的建议》。周森说,目前中国对于善款的分配和用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信息

查询系统。善款的来源、运用和去向等信息不透明,导致慈善机构和捐助活动的公信力不足。这种状况影响了中国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2011年,他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完善基金管理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的建议》。周森说,目前,由于慈善基金设立门槛较低,有些不知名的基金会以优惠的条件,吸引企业或个人设立基金,这就造成了很多漏洞。如,成立基金的目的不明确;没有专属的项目和专业团队操作;项目选择的随意性较大,或许轰动一时,却没有后续发展;基金会为了留住基金及基金管理费用采用放纵式管理。他建议,慈善立法时应制定相应的条款来加强公益基金的管理。

现在,推动慈善立法被周森既当作了自己慈善事业的一部分,又成了履行人大代表职责的一种需要。✘

童国华：信息产业既要修“路”也要造“车”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孙海潮/摄影

讯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的三网融合。2010年，童国华再次在人代会上提交了关于加速推进三网融合的建议和关于加快布局信息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建议，“今年看到‘三网融合’已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并要在全国推广，我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高兴。”童国华高兴地说，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对国家经济建设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十二五”规划中提到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信息产业排在第二，“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用了很大篇幅讲信息产业，而且讲得很细，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信息产业的重视。”

童国华认为，信息基础技术的发展将会拉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经济建设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下一代互联网，或者是物联网、智慧城市、三网融合等等，都是信息化深度融入工业化，都要信息技术的支撑。”但在信息技术、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形式下，到底如何发展，如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真正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是童国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童国华说，我国信息产业在“十一五”期间已经完成了由低端制造向高端制造的拓展，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可以说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但现在，新的信息技术正在朝终端多元化应用的深度和广度发展，我国在设备和终端的利用等领域跟发达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产品利润差距也很大。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会修马路了，但是马路上跑的车可能比修马路更赚

钱，而且可能人家跑的已经是劳斯莱斯、奔驰了。”童国华用形象的比喻向记者说明我国信息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他认为我国接下来应该加大研发高回报、高附加值产品的力度，但往往这些产品也要求高成本投入，再加上技术更新换代快，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议国家在信息产业的发展规划中注重顶层设计，注重在软件技术、信息通信应用的核心技术领域的设计，在多用途的终端领域进行更多的投入。”而在产业布局上面，他建议国家培植技术集中区域，让有实力的企业把各方面的生产力集中起来，增强产业集聚效应，有效提升核心竞争力。

一个新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生产应用要经历制定标准、申请专利到把技术变成产品，再成为商品，最后规模化生产应用几个阶段，“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重要一环就是怎么把产品变成商品，需要政府在这个环节加大推动的力度。”童国华还建议国家完善、规范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办法等法律法规，支持新技术的应用。

童国华头上有中国品牌建设十大杰出企业家、中国信息产业年度经济人物等多个荣誉光环，同时，他还是一位积极履职的全国人大代表，经常在工作之余接待群众的来访，听取群众的意见，“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我也非常乐意做这些事。我会继续尽责履职，更多地反映民意，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民生方面，更多地发挥我作为人大代表的责任和作用。”

童国华身上有好几个标签：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科研院所领头人，企业掌门人。身为武汉邮电科学院院长和烽火科技集团董事长，童国华致力于推动我国信息技术的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他更是积极发挥专业和职业的优势，几年来，围绕通讯技术，先后提出了关于宽带接入、信息产业结构调整、三网融合、光纤下乡等诸多建议。很多建议都已成为了现实。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到武汉邮电科学院做“十二五”规划的调研时，童国华就向总书记建议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打开通

郭新志：让残疾人更有尊严地活着

文 / 本刊记者 夏莉娜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院长郭新志谈得最多的话题还是关于残疾人和脑瘫患者，而她更为关注的是小儿脑瘫患者。她向记者摆出一组数据：我国有8300万残疾人，其中有300余万脑瘫患儿。

郭新志是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天天与身边的残疾人打交道，这些数据让郭新志牵肠挂肚。她当代表近9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走访、整理撰写的议案、建议文稿和调查报告足有两尺多厚。她坦言，作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残疾人的生活现状不尽如人意。他们与健全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生活差距越来越大，在生活保障、康复教育、就业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

小儿脑瘫和老年性痴呆一直是困扰人类健康的顽症。郭新志经过20多年潜心研究和艰苦探索，在黑暗中打开一道门缝，实现了脑瘫从不治到可治的飞跃。她的《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要从产科抓起》和《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营养法》的议案受到卫生部的重视和采纳。党中央、国务院及卫生部对她提出的“大脑亮点工程”非常重视，专门拨款150万元用于脑瘫康复研究。

一个小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家庭带来无数欢乐。然而，当孩子是有腿不能走、有口不会说、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的脑瘫患儿时，则给家人带来无尽的悲伤与困苦。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郭新志与其他5名代表联名提出《建立出生缺陷防治体系》的2985号建议，引起卫生部、财政部、中国残联的高度重视，认为建议条理清晰，立

意高远，前瞻性、操作性较强。他们采纳了代表建议，对办理工作作出安排和部署，提出明确具体要求。在全国落实婚前和孕前、产前及产后三级防治措施，使广大妇女消除顾虑，自觉接受检查，补服叶酸，并推广适应技术和开展逐级培训，明确妇幼保健机构定位，提高人员素质，规范服务。建议办理完毕，卫生部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发出278号答复函，向郭新志进行书面答复，征询意见，感谢她对脑瘫患儿康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郭新志除了门诊、科研外，作为人大代表还要调研写建议和议案文稿……她说自己每天睡觉还不到五个小时。问她的动力从何而来？她笑着说，我有“精神支点”——社会责任。一个小儿脑瘫患者至少拖累一个家庭，发病率就按千分之三或四计算，全国要有多少人？我们国家正在快速进入老龄社会，老年性痴呆的发病率直线上升。攻克脑瘫是我的责任，哪儿顾得上休息。我是搞残疾人脑科研究的，不管是小儿脑瘫还是老年性痴呆，都是分散了很少，集中起来很多，现在我们国家就有300多万这样的孩子，但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医疗康复。还有，一部分孩子没有办法上学，所以呼吁政府对特殊教育要加强投入，使他们能够医疗康复、特殊教育的康复、社区社会的康复。另一方面，我们搞老年痴呆的研究，这个病发病率也是很高的，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低龄化社会同时存在，不及时治疗的话，今后的几十年都是以残疾的形式来继续生活。如果我们加大研究，积极治疗，改善他们的健康情

摄影/王磊



况，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价值，也是为社会解愁。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今年1月份召开的山西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我多次提出筹建的山西国际脑康复医院项目被列入‘十二五’规划山西省重点建设项目。”

郭新志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近9年时间，曾先后提出促进残疾人就业、加强无障碍设施建设、构建综合康复防治、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等60多件议案和建议，件件得到答复落实。回想9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她感触很深：“自己提的建议被采纳，令我非常振奋，这是对残疾人赋予平等参与、共享权利的直接表现。希望加大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走出困境，能够更有尊严、更体面地活着！”

赵林中：心里揣着“神圣职责”

文 / 本刊记者 于 浩

在记者采访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之前，就知道他的鼎鼎大名了。因为一句“你有什么话要说，不妨告诉赵林中”，让他在家乡诸暨成为能向中央反映问题、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名人”。

如往年一样，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前夕，诸暨的市民又在报纸上看到了由诸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发文，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关于向全市人民群众征集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议案建议意见的报告》的通知。这样的开诚布公，着实让赵林中忙乎了两个多月，又是看信件，又是去调研，即便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接“热线”。

“我来自基层，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这个有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头衔和荣誉，又是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的赵林中没有丝毫的架子。他告诉记者，从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当了14年的全国人大代表，越发感觉到身上责任的重大。

14年来，赵林中提交议案建议1000多件，处理群众来信来访3000余件，成为基层老百姓通向全国人大的“连心桥”。赵林中说，要想知道事情，就要到老百姓身边去。比如，我家到公司有50分钟的路程，但只要有时间，我都会走路上下班，就是为了能在路上和十里八乡的人闲聊一番。

“作为代表，不能只关注自己企业、行业的问题，还要关注社会的重大问题，关注民生。”赵林中表示，自当选人大代表以来，这个宗旨一直未变。

这些议案、建议、意见中，每年都会涉及“三农”、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而让赵林中最高兴的就是，每年的议案、建议的答复。比如《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应举行听证会》的建议，引起了国家发改委和铁道部的关注，2007年春运期间，这一建议变成现实；《应从民生的高度定位纺织产业》的建议，引起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不久后出台的纺织工业和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中，纺织业被定位为“重要民生产业”，纺织品出口退税由14%提至15%，为纺织行业有效应对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人大代表，我的建议、议案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回复和重视，说明我履行了代表的职责。”赵林中说，像我这样的人大代表，就生活在老百姓的中间，把他们的期盼带上人代会，再将会议的精神和成果带回来和他们一起分享，就好像是一座桥梁。

“要珍惜代表这个头衔，那该怎么珍惜？就是要好好履行代表的职责。”赵林中一边说着，一边整理桌上的议案、建议文稿。“那作为一个业务繁忙的上市公司老总，这么多议案、建议，是不是会耽误了公司的发展？又涉及到哪些内容？”

“只有促进，没有耽误。”赵林中斩钉截铁地说，至今，他已收到来信、来函、电子邮件、传真等350多件，内容涉及对法律法规等的修改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等各个方面。我打算向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议案、建议、意见50件。

赵林中随手向记者递上了一叠厚厚的建议，这其中有关于修改收养法，严打拐卖儿童犯罪的议案；有关于粮食法草案的建议；关于尽快制定初级农产品目录并明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工商部门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分工的建议；有关于推广工龄工资，缓解“用工荒”的建议……

“比如，现行的法规缺乏对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权威性概念。目前，基层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如何确认某种食品是否属于初级农产品，进而确定由哪个部门监管、适用哪个法律监管没有明确的依据。”赵林中忧虑地表示，而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关于开展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的通知》的文件实施于2005年，与2009年实施的食品安全法相比存在较大时间跨度。此外，相比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这些部门均为非专业部门，其权威性有待商榷。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所以建议尽快制定初级农产品目录并明确工商部门与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职责分工，不要让食品安全出现法律真空。

一份份议案、建议经过广泛的民意汇集，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声音，通过赵林中这样的“代表桥梁”，反映到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使得法律得到立改废，问题得到办理和化解，进而让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人民心目中更加熠熠生辉。☑

杨绍军：“阳光使者”的慈爱心肠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关于杨绍军代表，记者早有耳闻，他倾个人全力开办孤儿院的善举为全国传颂，被授予全国道德模范的荣誉称号。杨绍军看起来很和蔼、慈祥，与他交谈，更能感受到他那颗对孤儿、弱势群体的炽热爱心，以及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坚毅决心。

杨绍军的阳光孤儿院从1996年开院，至今共收养了520多个孩子，其中近一半已走入社会参加工作，目前在院孩子中除了孤儿，还有一部分为双亲正在监狱服有重刑的孩子。话题一转到孤儿院的孩子，杨绍军显得特别开心，眉头都舒展开来，“孩子们”、“我的孩子”不离口。

“有能力时一定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一碗粥的恩惠，时年9岁的杨绍军就立下这样的志向。1982年刚解决家庭温饱的杨绍军就收养了7位孤寡老人，给最后一位老人送终后，他开始成立孤儿院。

杨绍军当全国人大代表已经9年了，他也当了9年的弱势群体代言人。“这几年来我提的建议都是围绕弱势群体。”他向全国人大提交过关于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建立乡村卫生院、农村五保户、建立农村敬老院，以及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孤儿的教育和生存、农村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问题等方面的建议。让杨绍军高兴的是，许多建议都被吸取、采纳，农村低保、农村五保户、农村看病问题等等，都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这9年来，党和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爱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在提高，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也确实很满意。”

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用很大篇幅谈社会保障，尤其提出“将孤儿养育、

教育和残疾孤儿康复等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杨绍军非常欣慰。“以前的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孤儿的问题，都只是说保障他们的生存，今年把孤儿的教育也纳入保障范围，这提高了很大一个层次。”其实，这正好应和了杨绍军的观点，他开办孤儿院的宗旨就是“养大为本、教好为纲、成才为的”，不仅要把孩子们抚养长大，更要培养教育他们成才，对社会发挥作用。“听完报告，我立即打电话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好高兴啊！”只要对孩子们有好处，杨绍军比自己得到实惠还高兴。

支撑孤儿院所有开支的资金全部来自杨绍军办的两个企业，至今投入到孤儿院的全部费用近三千万元，随着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孤儿院也不断扩大、更新设施设备。为了孩子们拥有健康阳光的心理，杨绍军让孩子们像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上社会学校，不享受学校的任何优惠待遇，并且给他们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在孩子的健康成长、成才方面，杨绍军花钱毫不在乎；对自己，他却是再简朴不过，一碗清汤面就是正餐，衣着也很朴素。“我认为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几十年当中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能够帮助别人，内心才最踏实。”

他的善心和爱心不仅仅局限在孤儿院里，每年他都还要资助许多因病致



摄影/谢素芳

贫的家庭，而通过资金等各种方式提供帮助的人数更是无法计数。

“在全国，我算不上老板，但是人力资源上，那我是第一。”杨绍军自豪地笑道，“多大的老板也没有像我这样的家庭人力资源吧，他们将来在祖国各个岗位为国家做贡献，这就是我的成就感。”杨绍军告诉记者，他不需要孩子们对他或者孤儿院的回报，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们把做慈善的爱心传递出去，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人，“我吃的那些苦就值得。”

一次采访就是一次洗礼。上有党和国家的总体精神引导，下有众多杨绍军身体力行助人为乐，我们的国家和百姓都将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

李红锦：人大代表不是荣誉称号

文 / 本刊记者 谢素芳



摄影/谢素芳

有“布面美容师”之誉的全国人大代表李红锦，是湖北荆州市乾盛纺织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布面美容师”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美，但她的工作并不轻松。李红锦初中毕业就进入这家纺织公司，到今年整整28年，勤勤恳恳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别人都认为枯燥单调的修织岗位。修织的乐趣似乎只有李红锦自己知道，她不但继承前辈传授的老方法，还在不断试验、总结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改进修织技术，她自创的“一针双线修织法”，经推广应用，成倍地提高了修织效率，为企业创造了经济效益。

2008年，李红锦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令她惊喜万分。“我从来没想到，我一个一线工人也能当

选人大代表，走进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对很多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李红锦兴奋地告诉记者她当代表带来的“效应”，“以前身边的亲戚朋友基本也都不知道人大代表是什么含义，到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不容易选上，自我当上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就更关注代表了，关注人代会，也知道可以通过代表反应他们的问题，向国家提建议。”

肩负着这一神圣的职责，李红锦努力当好代表。每年从北京参加完人代会回去，李红锦都要跟厂里的姐妹们宣传会议内容，讲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民生，特别是与工人利益相关的政策，“今年回去我要跟她们说国家在不断地想着怎么改善我们一线工人的生活条件，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且已经提出了好多好政策。”

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李红锦注意倾听百姓的困难，结合调查，她把这些最基层的声音化为建议提交到人代会，为工人、低收入群体代言。

她关注到许多言论提倡延长女职工退休年龄，这令修织女职工担忧，“我们这个岗位很特殊，平时都是靠眼睛看，对眼睛损害也很大，很多职工都是带着老花镜在修布。”为此，她在今年人代会上建议不要延长纺织行业女工的退休年龄，如果要延长的话，应该规定可以根据行业岗位特点确定不同的退休时间。此外，她还建议对棉纺织企业实行棉花增值税进项和销项税税率相统一。她说，纺织行业实行增值税的高征低扣，导致行业利润薄，纺织工人的工资待遇也很难提高。“我参加纺织协

会听到的都是反映这方面的问题，由于工资太低造成这个行业招不进人、留不住人。”

李红锦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嘉奖，比如荆州市劳动模范、湖北省劳动模范、湖北省纺织系统先进生产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再加上资历深，很多次，公司要给她升职到更轻松的管理岗位，都被李红锦拒绝。“我更热爱一线技术活，干技术活让我感觉更实在。为企业创造了价值，带出了更多的新人，感觉自己起到了作用。管理岗位虽然会更轻松，但我想并不适合我。”

在技术工人紧缺的纺织行业，也有很多企业、老板出高薪“挖”她走，但李红锦每次都选择留在工资并不高的原公司。“是企业一步步的培养，使我有今天的这些荣誉，我怎么能辜负企业，工资虽不高，但我想人对钱的欲望不能太大，自己内心满足就行了。”“满足”是李红锦话中出现最频繁的词语，“跟其他姐妹们相比我是最幸运的，她们跟我一样很辛苦很努力干了那么多年，我可能就是比她们稍微用心点，我就比她们得到了更多荣誉，我已经很知足了。”短短的半小时接触，记者深深地被这位基层代表的朴实、敬业、忠诚感动。

去年，李红锦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圆了她的一个梦想。但问及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感受有何不同，李红锦则颇有感触，“非常不一样。当人大代表是代表人民群众去做事，要反映他们的声音，为人民呼吁。代表更神圣，代表是任何一种荣誉称号都不能比的。”

宗成乐：村官要时时为村民着想

文 / 本刊记者 李小健

23年前，一位山东大汉曾许下心愿：一定要让村里的乡亲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如今，他的心愿越来越清晰，且已是能看到见，摸得着。

这位山东大汉便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滕州市张汪镇大宗村党总支书记宗成乐。“两会”期间，他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其位必谋其政，当中央干部，就要为整个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当地方干部，就要造福一方；当一家之长，就要让家里每个人吃好吃好过好；我们村官也一样，要时时多为村里老百姓着想，兢兢业业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宗成乐向记者回忆说，1987年，大宗村与全国多数地方一样，村民们沉浸于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大家只顾埋头苦干，只顾自家田头收成，人均年收入不足300元，但都盼着多种粮食过上好日子，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就在此时，一直想为村里群众做些实事的宗成乐获得高票支持，当选为大宗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并立下铮铮誓言：一定要让村里的乡亲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共同富裕。

“村民们过上好生活的愿望，如果只是靠种地，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认为，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大宗村必须发展经济，做实业，只有走工业化之路，方可带动致富。

目标既定，宗成乐马上张罗起来，一边与其他村干部管理其他村务，一边把家里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带头成立企业，发展实业。“当时，我们一穷二白，资金、

技术、管理等什么都缺。最主要是启动资金，除了自己的家底，其余全靠向亲戚朋友同学借，一人一点，求爷爷拜奶奶，陆续借了几十万。”

“在企业创始过程中，有酸甜苦辣，有曲折，有坎坷，这都要克服。要有耐力，保持胜不骄，败不馁。”就这样，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苦干加巧干，宗成乐的企业逐渐成长起来了。随后，宗成乐又拉上本村多位村民入股，组成股份制企业，规模越来越大。

大宗村及周边村庄，农作物以地瓜为主。瞅准这一原料优势，善于动脑筋的宗成乐1993年办起了瓜干淀粉厂。后来看到玉米淀粉更赚钱，立即上马玉米淀粉生产线。1995年到2007年，经过三次技改，现已形成年产10万吨的生产规模。

2001年5月26日，大宗村又一个项目——煤矸石热电厂正式并网发电。目前，大宗村拥有企业18家，形成热电、生物化工等10大系列120多个品类，拥有总资产12亿元。

在企业做大的同时，大宗村的面貌不断变化，并获得“鲁南第一村”、“山东省十大名村”等诸多美誉，宗成乐也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兴村富民百佳领军人物”和“全国新农村建设十大功勋人物”等众多荣誉于一身。2008年，宗成乐在省十届人代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成为枣庄市唯一、山东省14位农民代表之一。

“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做到了，包括我们大宗村的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都不比城市差。”宗成乐告诉本刊

记者，首先是村民的收入增加，除了种地收入之外，村民还可以在农闲时到企业做工，拿工资，每个月至少能拿到1000元，根本不需要到外地就业。据悉，大宗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度提高，到2010年已达到12000元。

其次是企业每年都会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提高和改善村里各方面公共事业，让村民们受益。比如说，村里先后投入1.5亿元，建造了人均居住面积65平方米的“小康楼”950余套；建设山东省第一个村级文化广场；为村民统一办理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实现了水、电、暖、电话、有线电视、宽带“六通”；老年人可每月领“工资”……

人才是发展之本。宗成乐认为，“责任和义务在大宗的这一代，希望和挑战在大宗的下一代。大宗村的希望在明天”，提出“人才改造和培养工程”，规定：如果孩子考上高中获得3000元奖励，大专5000元，本科1万元；考上研究生2万元、博士研究生4万元，如果读到博士后，村里将送一座面积为200平方米的“才子楼”。

宗成乐告诉本刊记者，2010年，企业用于村里教育、医疗、村庄建设等费用达到600多万元。

“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我有机会向更多代表学习和交流。通过深入了解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可以更好地为村民服务，多做好事事实事，进一步改善和优化村民生活质量。”宗成乐表示，“十二五”，大宗村将发展重点转向环保低碳产业，如太阳能发电，利用秸秆发展循环经济等，与国家产业政策保持一致。☑

转型跨越 富民强市 共建小康 同享幸福

中共铜陵市委书记 姚玉舟 铜陵市人民政府市长 侯淅珉



省领导来铜视察



合铜黄、沿江高速立交



铜文化园广场夜景

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替点上,我们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都是要把目标谋划好,把蓝图绘制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更好更快发展。

“十一五”时期,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胜利完成目标任务,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人民群众的全面小康水平和幸福指数持续提升。

综合经济实力大步跨越。地区生产总值由“十五”末的182.8亿元增加到450亿元,增长1.5倍。财政收入由24.5亿元增加到88.6亿元,增长2.6倍。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29亿元,超过“十一五”之前历年投资额的总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实现工业增加值增长2.1倍。

转型发展迈出可喜步伐。全国资源型城市转型试点工作积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铜陵模式”在全国推广,节能减排目标全面完成。实施“千百亿”工程,铜产业向千亿,化工、能源等产业向百亿加速迈进,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大力推进自主创新,2010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是2005年的6倍。

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围绕率先建成全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目标,大力推进东部、南部城区、西湖新区建设。拓宽改造城市主干道路253公里,新增市区道路总里程76公里,“六纵六横”干线路网基本建成。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村村通公路、通广播电视、通宽带、通客运班车,农村饮用水安全覆盖率全省领先。进一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生姜、凤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改革开放取得明显突破。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完成中小企业改制任务。率先完成市直部门“大部制”改革,率先开展区直管社区管理体制,全面推开公务用车改革。全面完成基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任务。加快建设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市,加强招商引资,累计实际利用内、外资660亿元和10亿美元,分别是“十五”的11倍和4倍。加快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外贸百强城市。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累计投入财政资金21亿元,滚动实施民生工程53项,全市95%的人口得到实惠。新增就业10万人,城镇“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消除。率先免除洲圩区防洪排涝水电费,率先实行涉农行政“零收费”。全民养老保险和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由9524元增加到187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354元增加到6940元。

社会事业发展日益加快。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文化和体育活动场所、计生服务站、乡镇司法事务所等标准化建设基本完成。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社区建设、人口计生工作等保持全省先进。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全国科技进步示范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知名度进一步提升。

“十二五”时期,是我市提前八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期,是进入转型升级、建设幸福铜陵的加速期。综合考虑未来发展环境和条件,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是:

构筑世界铜都。基本形成以铜冶炼为基础、铜加工为主体、铜贸易体系完善、有较强研发实力的世界级现代化铜产业基地。促进二产、三产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基本确立,经济规模和主导产业规模跨上千亿元台阶,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提升皖中南中心城市地位。区域交通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城乡基础设施基本完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城市转型取得重大进展,铜都精神进一步彰显,城市形象进一步提升,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铜池一体化和跨江联动发展加快推进,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

建设幸福铜陵。“六大幸福工程”建设深入推进,“四大长效机制”进一步健全,城乡居民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事业明显加强,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城乡,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幸福指数全面提升。

格力**1赫兹**变频

最低功率**只需45瓦**^{*}

让节能舒适**1**路领先

- ◆ 全程超凡节能
- ◆ 21分贝静音^{*}
- ◆ 极致精准恒温
- ◆ 3种睡眠模式
- ◆ 独创7档风速
- ◆ 15.3cm超薄机身^{*}



带^{*}号功能仅限26机



魅力之邑 中国铜川

中国煤都 建材基地 苹果之乡 陶瓷故里

铜川位于陕西中部，1958年建市，辖3区1县和1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面积3882平方公里，人口86万，城镇人口占56%，是全国第二批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关中——天水经济区次核心城市和陕甘宁革命老区生态能源经济协调发展实验区成员。

